

鍾建

五論

陳伯莊

書
見
三
八

自序

於工業化之過程中，建立民生主義之經濟制度，務須把捉關鍵點，及因時制宜處處不齊放鬆之總原則，使經濟進度與制度相適應而不相礙，以收達此目的。其關鍵措施及基本政策何在，此為經濟五倫所擬解答者。

工業化之根本條件，在自主經濟之條件，其條件則視夫總模生產所需之技術和組織能力之養成。其推動力可為民間進利獨之生意（和英美），亦可為政府發展國營產業之革命熱心（如蘇聯）。國人素易趨商，自主經濟既由抗戰而完全獲得，若積極獎勵民營，一任資本主義坐落之發展，工業化固可實現。若欲實行主義，發達國家資本，則必須充分加強國營能力。其問題為（一）如何使從事國營者能放手做事，認真做事，安心做事，（二）如何使智能之士願研農才與令民營而親國營。

「民生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實行，」其實行之途，實由平均地權及節制資本及發達國家資本而後，人不但要有發達國家資本之能力與辦法，更要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意志與決心。民生主義之條件，是民生主義與和平革命，不特階級意識，其中志力亦非何所專執。工業化必需資本，國家資本來源，除稅賦及國營餘利之外，其最大來源何處。國家經濟於工業化，必須以農補工。如何動員農產價值之一部份，使成為工業資本，且使其

成爲國家資本。

積極工業化，必需資本總動員，限制民營是否足以妨礙資本之總動員。現在民間資本其最大來源何在，循何種方式取得，是否可以釜底抽薪移花接木使其國家化。又資本總動員之真諦何在。

加速工業化，除借用外資以補國民蓄積（即自創的資本）之不足外，如何可以反利潤之計劃經濟增加工業化之速度。所謂全體性的效能爲利潤經濟所無而計劃經濟所獨有者，如何使其實現。

建基於農村上之新體制爲民權基石，土地改革爲農村中心問題，此爲民權民生最重要之互接點，如何方得合理之解決。又耕者有其田之先決問題何在。

對於以上種種問題之答案，是爲關鍵措施之擬議。

資源比較不豐，可耕而未耕之地不多，人力有餘，資本極缺，國民蓄積在國民所得中所佔之百分比爲數極小，且極難增加。以言環境，則自足經濟，非其所宜，以言進程，則自力更生，艱辛艱難。對於人口，土地利用，礦產開發，交通建設，人力利用，國際貿易，外資利用等基本問題，而擬議其答案，是爲基本政策之擬議。

吾人欲求民生主義真實的實現，毋使落形式主義的窠臼，對於其具體制度應有所擬議，此制度之應用與功能，應有所了解。最近 總裁指示吾人所應取之手段爲計劃經濟與社會立

法。依 總理遺教之三大路由與 總裁所指示之兩大手段，本論所擬議者如次：

循發達國家資本之路由，使固有國營之經濟領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擴大至領導地位而具有決定性，然後有真的計劃經濟之可言。發揮固有國營經濟領域外沿價格之功能，使其在整個「價格——所得」結構中（Price-Income Structure）具有決定性，指導性，調節性，然後節制資本之作用方為內在的而非外施的，經濟的而非政治的，市場的而非法令的，不可避免的而非可以規避的。民生主義容許私資本之存在，而不容許其所寄託之私有私營經濟領域過分擴張，喧賓奪主，釀成階級鬥爭。故對私資本所施之所得稅遺產稅，對私經濟行為所施之統制管制，祇應視為為節制資本之輔助手段。

註：固有國營經濟領域與私有私營經濟領域之接壤處，為固有國營經濟領域之外沿。所謂外沿價格即兩領域各接觸點之市場價格。固有鐵路對私營煤礦之煤斤運價即為外沿價格之一。

抗戰後，工業化之時機十分成熟，故戰後五年為關鍵時代。

本刊五論，除工礦業下篇經營大公報星期論之外，餘均為屬經濟建設季刊之作。茲於刊印專集時，特向大公報及經濟建設協會致謝。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陳伯莊於重慶

羅 處 五 倫 序 言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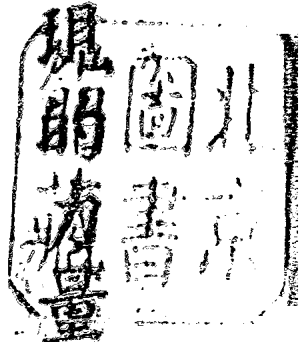
經建五論目錄

- 一 總論 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及推動其實現的力量——建立中心力量來保證民生主義的實現
- 二 農業 建國的農業政策
- 三 工礦業 上篇——建立新工礦政策的兩個先決問題 下篇——工礦業因營民營領域應如何劃分
- 四 交通 戰後鐵道交通所負的建國使命
- 五 國際經濟 貿易，投資及匯兌——建立新的國際關係

組
成
五
輪
圖
解

一 總論

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及推動其實現



——以民生中心力量來保證民生主義的實現——

只要民族得了解放，國家完全獨立，次殖民地的羈絆完全脫離之後，中國是一定可以工業化的。我們的資源和人力，農工大眾的勁勢和智慧，都是頭等，近代大規模生產所必需的科學技術和組織，已經有了多少基礎，我們的領導份子已經很明顯的表現了他們能夠接受運用乃至發展這些必需的本領。所以我們工業化的基本條件完全具備。祇要國際壓迫解除之後，加上了二三十年的起平，工業化的進展，必然是沛若江河莫之能禦的。

可是以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走到那裏去呢？假如我們要到長治久安富強康樂的境域，要正義和自由的光輝普照着我們的禹域，我願竭誠的向熱心經濟建設諸公，一貢芻蕘，就是：「方向重於進度。不可穩視制度，噴為迂闊，以為把鐵路礦場工廠趕快建設起來，才是實在，其餘一切都可以在這就些馬虎些。更不可雄心勃勃，一味想做實業大王，其餘一切，都不放在眼內。抗戰後五年及決定我們以後國運的最重要關頭，有權力擔負起經濟建設的諸公

552.201
385
2

可以起我們帶到天堂去，也可以起我們帶到耶魯裏而為不均，不忠實而為不安的劫掠去。

一個社會有正義才能安定，有思想自由才有進步，有行動自由，然後人生的意義才能美滿。這本來是為生常談，但真正為自由與平等並茂，却是很不容易的事。

自由固然是法律的保障，但僅僅有法律的保障是不夠的。一個人要不高舉順從政府的意見，還要清茶淡飯的日子好過，必得手裏有幾文錢，所以私有財產的制度，才是自由的真正要緊。中國士大夫起時，所謂「長揖揖田園」，他們何嘗是回去做牛犢農家，躬耕南陽，大概還是收稅租的小地主階級，才能有明膏淨兒，去著書立說。陸澄光要有了生活自由，才有思想自由。因為在資本主義初期的中產階級為自由平等的中堅力量，因為他們謀生之道，祇靠自己努力，不要仰著別人鼻息，他們不是自由職業者，便是自耕農，或有一爿不太不小的生意，不能壓迫人，也不為人所壓迫。這樣的自由，當然又係以私有財產和做生意為其條件。另一方面，我們一看現在的絲綢，他們就沒有廢止私有財產，但絕對不許做生意（不能雇工生產，使財產成為工傭資本，不能做買賣，使財產成為商業資本。）所以一天停正做工，便覺他吃山空，一切謀生之道，都除沒用的計劃想盡支離完了。你等處抗起政者的型行，任憑你走過了地角天涯（實際不許走動），找不到一件事做。老子之治天下，「虛其心，實其腹」，「廢其器制了個個人的肚皮，便澈底管制了個個人的頭腦了。」

但在正義方面，在經濟公道方面，蘇聯已大大的成功。工業資本完全國有，農業資本為集體農場所公有，又因農產由政府定價收購，實亦等於國有。人們再不能以生產工具和商品來掠奪人們。勞力所造成的財富，全國國民所得，分為公有與份兩大部分。他們拿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力量，舉制裁一切，完全剷除了資產階級。他們非常徹底要根本剷除而做生意賺錢的意識。現在這種餘意識，而留在集體農場員心中。因為他們各自還有一塊隱蔽，可以自己種菜、養雞、釀蜜，拿到市場出售，不入金庫。當其舉辦集體農場的時候，曾經依僱大工的富農絕對不許加入，因為這些人打慣了生意算盤，怕他們拿出精明的猶太本領，取得農場的領導權，化為私，破壞全體無產階級的共產黨認為社會主義的意識和「做生意賺錢」的意識在一個社會之內，絕對不能相容的。他們認為「一黨所轄，十年尚猶有良」，拿剷除惡務黨的決心，來斬草除根。但是十分正義的無階級的社會成立之日，亦即速抗政府黨志的人謀生路絕之時，於是乎正義與自由，兩美不可得兼了。

「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真是至理名言，既然無無弊之利，立制使不需極端，亦無無利之弊，除惡使不需務盡。正義為安定要素，自由為進步要素，如安兼務並茂，惟有以多少的不正義，來維持最大的自由，以多少的不自由，來維持最大的正義。這樣的社會狀態，要拿怎樣的經濟制度，才可使他實現呢？就個人意見，我們祇要遵從「國父遺教」循平洵地推節制資本的途徑，將現階段的經濟，加以節制，循發達國家資本的途徑，積極發展國家實業

，崩裂及發展的结果，使國有國營的經濟領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具有決定性，那時私資本儘管存在，不能發揮其標準作用。這樣的經濟社會，是可以使正義和自由兼帶並茂的。

在農業方面，就要消滅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農產品運銷的關鍵階段，即省際運銷及國際貿易由國家經營，一方面保留自食其力的廣大農村為自由的中心壘壘，一方面由國家把握着農產流通的關鍵，以調節價格的手段，確定農村所得，并動員其一部份，為工業化的國家資本。

在工商方面，應限制私有資本的經營範圍。其進行步驟，自甚複雜，不能預為確定，但應以迅速把握關鍵點，及因時制宜處處不肯放鬆的原則，積極推進。現在政府已把握着全盤經濟的中心樞紐，自從法幣推行及四行聯合組織成立之後，親成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動力已操在政府手中，四行中雖有商本，但金融資本的功能，實際已屬國有。如再加設金融管理局，所有私立銀行的長期投資，即對民營廠礦及其他工商業的固定投資，須經該局批准，如此整個國民營積之最大部份，皆由政府控制，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例如淪陷區收復之後，許多廠礦，均須籌款修理，方能復業。如四行借款給原采民營業主，則私有資本的經濟領域，從此恢復而增長增高。如果四行借款給政府，將該項廠礦，備價收回國有，則國有國營的經濟領域，從此擴大。個人預料此點將來必有一度極劇烈的爭持，民生主義的經濟與資本主義的經濟消長之機，將於此卜。

重工業在工業化的初期，除煤及特種出口礦產之外（如錫、鎳、汞等），大抵無利可圖，本非私資本所追逐，輕工業如紡織、麵粉及一般供給國內現成消費市場的製成品，和國外現成原料市場的加工品，均私企業私資本所必爭取的經濟領域。時賢注重生產效能和成本的，多主張劃歸民營，假使國營事業的效能，根本無法提高，其成本根本無法減低的話，何不索性以保息保利的方法，把工業化最重要的鐵路和鋼鐵亦劃歸民營呢？國營事業所有種種缺點，斷不是不能改善的。如果預算財務材料以及各種營業制度監督制度打格牽制，強人作偽，造人做官，弊不能防，祇是失時誤事，如果人事制度薪給制度不能使人安心努力，如果事業主管人，必需努力做官，而不容許認真做事，如果政府任免局長廠長可以高下在心，或者敷衍人事，而不以或不能以效能成績為衡斷，這些都是臨時的政象，均可以澈底改善的。如果說利潤動機係最有效的經濟動力，我祇可以說他不是民生主義者而是資本主義者，並且是對於利潤動機造成企業循環經濟恐慌的事實，不甚講求，或有所維護，不肯講老實話的資本主義者了。個人的意見，輕工業之有關鍵性及全國性的應劃歸國營，其已輕民營者，必要時亦須備價收歸國有。例如紡織工業，紡織是集中的，大規模的，關鍵的，應歸國營，染織是分散的，可由民營。又如捲煙工業、火柴工業，在外國產生了捲煙托辣斯和火柴大王，在民生主義的國家，究竟應歸國營或民營，還請時賢自行判斷。

至於商業不論該商品為工業品或農業品，其集散運銷批發零售全程中各有其關鍵階段，

凡商品之有全國性者，其貿易的關鍵階段均應由政府經營，以把握實物，調節價格的手段；來（一）限定工商企業的利潤，（二）保障消費者的實際所得，（三）動員工商企業所得的一部份，為國家資本。這樣的工商制度，聯視之似乎固有國營的經濟領域非常龐大，所需要的事業單位，非常繁多，所需要的技術和組織，又非初期所能勝任。個人的答復是：一方面不得畏難，要積極穩進，另一方面從個人所深知的實際情形，這些關鍵階段和地點，並不太多，農產品的關鍵階段在二級集中市場，全國成為商品作物的各主要農產品的二級集中市場，祇有幾十個，製成品的關鍵階段在出廠，貿易委員會統稅署以及現在推進中之專賣機構，對於這些關鍵階段均沒有視為畏途。

固有國營的經濟領域之擴張，一方面對現有的農工商加以如上的剪裁，另一方面積極發展國家實業，（交通工廠等等）循該領域外沿價格的作用，便可在國民經濟中，具有偉大的決定性。（外沿價格係個人利用的名詞，指固有國營經濟領域與私經濟領域各接觸點之市場價格）他能夠決定物力人力的用途，決定資本品和消費品的生產比率，決定國民所得之蓄積和消費比率，決定國富的增加率，決定「價格——所行」的結構（Price Structure）。固有國營的經濟領域擴張至如上所述之後，私經濟的領域退居到（一）自耕農，（二）小工業，（三）初級二級集中市場之間的販商，（四）零售前一段之批發商，（五）零售商等地位。國民經濟日益豐裕之後，這五種人都可達到中產的生活，這五種人的生意，都是可

以取得中產生活而反正做不大的生意。留着這個經濟領域，做自由的堡壘。

這樣的經濟制度，是合乎民生主義的。國父說他自己是社會生理學家，而馬克斯是社會病理學家，馬氏看見了勞資兩階級廣遠對立，病狀已成，不設法醫治，反而推論病理的繼續發展，以斷症的口吻，肯定無產革命的必然性，確是病理學家。國父則得患未然，以平均節制的衛生道理，以發達國家資本的自然生理，使社會本體健全發育。我們可以引伸來說，真正的生理，是國家資本細胞的功能，自由的生理，是私資本細胞的功能。但反真正的社會病菌，最容易寄生在私資本細胞之內，要有妥善的方法，防止其滋長蔓延，而國家資本的細胞，不具有自由的生理，假如整個社會機體，全由這一種細胞所組成，那自由的生理便窒息了。

但是建設這樣的經濟社會，必要先把決心建設這樣社會的中心力量建立起來，還要由這個中心力量繼續主持國政二三十年，來完成以工業化為內容，以建立這樣國有國營的經濟領域為制度的工作，還要盡力把這中心力量變成為穩定的社會要素（Stable Social Element），保證私資本的領域不再擴張，不能奪食國有國營的經濟領域。個人這樣的希望，係根據下列種種答案：

（甲）一個社會的發展和變動，在很大範圍之內，是由於他的中心力量所宰制而成的。

（乙）國民黨因為他的主義和歷史，當然是現在的（中心力量），應該繼續秉政三十年。

以後由訓政或選舉是另一問題）因為要完成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並且使這樣的經濟社會，成為穩定的社會機構，責無旁貸。

（丙）我們不能不承認國民黨員實現民生主義的意志和決心，應大大的加強，心理建設需要有所基礎，要建立這樣堅強的意志，積極的必要建立黨員生活保障制度，消極的必要絕對禁止黨員做生意和參加一切私資本的活動。如果仕而優則商，商而優則仕，如果實業大王可做大官，大官又可兼做實業大王，這樣的社會必然要走到資本主義的途徑去。

（丁）在工業化和建立國營經濟領域之過程中，要養成新興士的階級，使成為穩定的社會要素，以為國營事業的支柱。士的特點是正其誼不謀其利，具體說來，是不准做生意，以後要制定法律，凡在國營事業服務滿了五年之後，便須宣誓不得參加任何私資本活動，否則立刻退出，永不任用。私經濟的領域，祇有反正做不大生意，使社會的智勇辨力聰明才智的份子，不願留在這催促的圍地，而向國家事業發揮其本領，並且厚其報酬，月薪一萬元的局長廠長或工程師，不但不是荒謬而且是極應該的事。

讀者對於這樣的希望和理想，必然有兩種不同的懷疑。一種是「一黨一統十年尚猶有臭」，一個社會中資本意識和社會主義意識，必不能相容的，這可以說是對民生主義的懷疑者。又一種是現在大勢所趨，這樣的理想必然辦不到，這可說是國民黨的諍友。國父說知難行易，個人對主義懷疑者的答覆是，我願以盲從的信仰，實驗的態度，照着國父的遺教，努

力三十年。至於時友之論，係每一個黨員應該拿來反省的。現在再將（甲）（丁）兩項加以討論。

我相信一個社會的發展和變動，一方面可以由中心力量來宰制裁成，一方面最好是順着國民特性和歷史遺產(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 Historical Heritage)來推進。中國兩千年來的經濟制度和狀況之演進，在大體上雖然與世界人類進化歷史是一致的，——從封建社會到資本社會——但中國和歐洲比較，確係在這個一致中，成為兩個別體(Divinity)，或者說得合理些，如果我們以歐洲為正體(之「正體」)，則中國為別體。中國這個別體，個人覺得係由於一姓王朝維持其專制政權之延續的中心力量所裁成的。自從郡縣制度發明之後，而一姓王朝統治宗法社會的農村的手段，陸續展開。王朝所最忌的，是民間分他生殺之權，有飯給人吃——養士——使操了生權，殺人報仇——任俠——使操了殺權，所以民間富貴玉侯的商人，在所必除，在產品比較一致的農村，祇有特種商品如鹽鐵可以買進致富，一經收歸國有之後，民間操生殺權的富源，便沒有了，而商業資本從此不能抬頭。其次王朝所忌的是人民私通外國，出入邊塞，樹植起一種管不到的勢力。所以國外經商，及殖民，均絕對禁止。所以一方面國內的治亂，週期的受了人口律所支配，又一方面則憑借著國際貿易而發展的商業資本，亦永不發生。土地問題，兼併和反兼併的均回制，雖然鬧了兩千年，但長子單獨繼承制，早經封建制度消滅，所以大地主階級，亦永不發生。聚斂之方，惟有墨吏，

儘管廣置田宅，再傳再分之後，小人之澤亦復三世而新，所以沒有大地主。在海禁未開之前，富民祇有鹽商，但因稅制的關係，他們委備首貼耳，聽命於官府。於劇而四海之內，億兆之民，祇有甚貧而無甚富，更無離開做官和仰承官府的鼻息，而有獨立致富的途徑。二千年的中國經濟史，沒有歐洲工業開前的航海殖民和商業資本，皆係一姓王朝維持專制政權的中心力量所宰制出來的結果。封建制度，在英國變為代議制度，而發生了民主政治。在歐陸諸侯對峙的夾縫中，產生了自由市，商業資本，遂以勃興。蒸汽機發明之後，發生了工業資本，假如蒸汽機在中國漢武帝的時候發明出來，我想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必會將他收歸國有的。

兩千年來，士農工商四個階級并立，而士為領導階級，這又是一姓王朝維持專制政權之延續所宰制出來的結果。士并不是經濟階級，而是由選舉制度科舉制度造成的，是聰明的皇帝，使智勇辨力的天民優秀份子聚集起來，分給多少富貴餘沫，來消磨他們特別優厚的精力。要他們僞冠僞服，順從孔子的臣道，要他們正其統而不謀其利，免得他們不奈不厭。凱蘇斯（Cicero）的經濟通論，有一段談到蘇東坡的暴士論，他說：「從社會的及心理的立場而論，我們相信貧富不均，儘有他的道理，不過不應該像現在這樣懸殊過了。有好些有益的事體，還要靠私有財產的制度，和算準為利的動機，才能做得到的。況且人類有不少的慷慨不測的危險性格，若不許他向比較不危險的途徑——賺錢——來發揮，便要橫潰決裂，向爭權爭富的途徑發揮去了。讓他們坐擁銀資，索然稱奇，總比他們向人們肆虐好些。爭利雖然起

爭權的工具，但是有時亦能滿足爭權欲的代替劑。可是這爭利的賭籌，不應該像現在這樣大瀾了，祇要大家打慣小牌，也可以安然自得。『智力份子向賺錢的途徑去發揮的結果，發生了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這說來比較的不危險，是我們所不能贊同的。但是凱因斯想把天下法律納入賺錢制度的教中，和明太祖要把天下英雄納入他科舉制度的教中，都是承認智力份子在社會的重要性。』

不論士的階級如何造成，總是我國最大的歷史遺產，而國民性又可以「士風」兩字，做個總寫照。士風非有隆替，而兩千年的涵弘養育，深入人心，成為極悠久堅強的特性。成仁取義，正其就不謀其利，則其理不計其功，是士的理想。其經濟特徵，又可以「士大夫階級」一句話來做個總寫照。自從海禁開後，經濟發生變動，商埠買辦，歸國華僑，市井商人的提出份子，却到了上流地位，留學教育，教會教育，洋書教育（如香港皇仁書院等）都樹了新幟，社會漸漸發生變化，然而資本主義的進展究竟有限，讀書做官的份子，仍為社會的廣大基礎（士者仕也確是個切實定義）。如果做生意的圈地日日拓張，社會的智力份子都如凱因斯的希望到了這個圈地去發展，士的階級便要消滅了。我們現在還可以及時限制私經濟領域的拓張，使智力份子進求功名富貴到圈有圈營的經濟領域去活動，順着國民特性和歷史遺產，造成新的士階級，保存着讀書人不做生意的特色，保存着士階級的評價次第，和社會風尚。工業化的過程完成之後，圈有圈營的經濟領域，卓然確立之後，社會經濟內容穩定之後，這新的士階級便可成為穩定的社會要素了。

二 農業

建國的農業政策

一 總論

(一) 新體制為民權主義的基石，這個基層政治建築在農村區。現在支配農村經濟的最大力量是地主階級，從地租的積聚到放賬販貨的經營，從販貨盈利的積聚到土地的兼併，輾轉趨變，子母相生，於是地主販商以及高利貸的老闆打成一片，將農村金融及貨物流通半半的把捉着。農村經濟不加改造，縣鄉村的基層政治很容易變為地主政治。農村經濟的根本改造，要從實行耕者有其田做起。

(二) 於實行這個重大土地改革之前，我們要趕緊廣泛的組織農戶產銷合作社，來做農村經濟的新動脈，預先打破地主販商的把捉，而減少土地改革時的障礙。

(三) 農業在現階段為最大的生產，其產值為國民所得的及大部份。不但如此，各種農產品的價格在整個經濟中也佔極重要的地位。他與產農所付，消費者負擔、工價、工業原料成本，土地利用方向等，均有密切關係。我們要設立國營各種主要農產品公司（如穀物公

司棉花公司等），把握着農產運銷的關鍵階段，來調節統制其價格，確定農民所得，並且動員農產價值的一部份（即公司盈餘），使其國家資本化，從自力更生方面找建設資本，此為最大的源泉。基於同樣理由，主要農產品的國際輸出，應完全收歸國營。

（四）從改進農業，興修水利，開闢荒地來增加每畝產量和耕地畝數，實為增加國富的最廣大最迅速的手段。這應與工業化相輔而行，相依為用。農業既為民間生產，故農政之推行，必在親民的縣和管轄的省。因此省有設立農政廳之必要，而督導全國農政的農林部亟應趕緊高度科學技術化。

以上四事為建國農政政策之最重要者，但農村最重要而又最難解決的問題，却不能以農政策來解決。這問題是：如何增加每人耕地畝數。用唐朝的話來說是：如何使狹鄉變為寬鄉。用近代的話來說足：如何蘇解人口對土地的壓迫。

二 農村經濟的概觀和前瞻，每人耕地畝數，建設農業所 需的資本

平均每人耕地畝數太少，地雖大物雖博而人更多，生之者眾而食之者亦眾，農民極端窮苦，人口不斷的向土地壓迫，此為中國經濟最中心的問題。幾千年來，川燒山砍樹，不花本

鏡（因為窮沒本錢），就阻止渴的方式（註一）來拓展耕地。經過幾個雨季，所拓山田，土壤陸續沖薄，山下原田陸續為山洪帶下的砂礫所掩蓋，泥裡砂重，土去砂留，年復一年，雨水流度日急，土壤沖蝕益甚，又因燃料缺乏，被砍樹木日益多，蓄水無法，雨來則洪流氾濫，而去則無水可用。在生活極端窮苦，資本極端缺乏，各個農戶獨力墾闢的狀態之下，所能墾闢之地不但早已盡闢，甚至好田變了壞田，水利失修過甚之區，耕地變了荒地（如西北），我恐怕人口與耕地的平衡日就劣境（耕地的增加趕不上人口的增加），農工與產量的比例日趨工多糧少的苦境。苦劣之極，則前者為每人畝數日少，後者為每畝產量日縮。又如湖南洞庭濱湖一區，年年向湖圩地，所以有大量的剩餘穀產，但湖身日窄，上游湘沅，每逢雨季，則泛濫的威脅，與年俱進，這又是與水平地的代價。

所以在內地各省可墾未墾之地極少，應墾未墾之地尤少。現在利下的水源林區，以及一般未伐山坡是為可墾未墾而絕對不屬墾之地。三十年來各省兵荒匪荒之地不免增加。但就大體而論，祇有水利失修荒，散佈最廣，總量最大。小而一鄉的塘壩失修，則在在皆是，大而一省的河道待治，則南北皆然。這些水利工程，都要花錢，小的可由社團，大的必須由政府分別舉辦。換言之，經過幾千年農戶獨個經營的殘缺園地，祇有投資建設，和公共行動才能救濟。全國水利修復所需的資本必為驚人的數目。但這筆資本花下去，三五年後，立見功效，農產大增，國民所得大增，是很值得的。所以在戰後初期的建設，我們應該把全國國民所

得按着十部份來做這個農村的基礎建設呢？若十部份來做國防建設呢？這是要我們的當局斟酌戰後國際國內全局形勢，從政治軍事經濟三方面慎重考慮來支配的。建設的資本，如不以賦稅，和內債或國營事業餘利的手段，從國民所得撥來，便須從國外借來。我們恐怕戰後國際情形的複雜，轉想到蘇聯革命後開起門來自力更生的傳統，感覺興奮。或者想到土地革命農產動員可以籌得極大的資本，感覺興奮。可是第一不要忘記，從自力更生方法籌得來的資本也許極大，但百廢待舉，全面建設所需的資本必然更大。第二不要忘記，我們的經濟根底太比太不上革命初期的蘇聯，我們的經濟機構又不如蘇聯之六強在手。蘇聯平均每人耕地畝數比我們大得多，每個農民的產值，於維持生活之後，尚綽有餘裕可以貢獻給國家來辦建設。換言之，蘇聯從農民徵取的國民所得比我們大得多，這是第一個根底不如人。他們當時已有的工業設備比我們戰後的工業設備又大得多，生產設備愈大，生產推進愈速，工業化的速度，開始越慢，其後突飛，這是機器生產的特徵，所以從起點的規模和速度而論，又是第二個根底不如人。而且我們沒有經過蘇聯式的經濟革命，所有生產工具沒有完全收歸國有，便不能暢行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國有國營事業的進度，全在政府決心，民營事業的進度，常被市況牽制，因此，國民所得的資本化，人力物力的建設化，其進行斷不能如蘇聯的順利，其進度斷不能如蘇聯的迅速。假如我們關起門來建設，二十年後必不能達到他們現在所達到的境界，這是我敢斷言的，專從自力更生來求工業化，恐怕二十年後，民生狀況不會有很大的

改善，人民程度不會有很大的進步，社會的內容不會有很大的改革，然而在此二十年中，實際的變化，國內的政治，會不會發生意外呢？而且在社會內容未經變質，則意外的政治變化，尤易發生，這是值得我們嚴重顧慮的一點。

每人耕地較前太少，既為經濟中心問題，增加全國耕地面積，當然是極端重要的事件。在內地各省以修復水利，在邊疆各省，以移民開墾為增加耕地的最重要手段。這兩樣都是需要公共行動和大量投資來舉辦的。於水利建設所需的資本之上，再加上移民開墾所需的資本，合成農業建設所需的資本，這個數目之大，細算起來，必在一般意料之外。

在人口向土地不斷壓迫的平衡狀態之下，我們現在的農村，經濟和農戶生活是怎樣呢？我可以大膽的先提出我的結論是：農民、牲畜、土地三者同在半饑餓線之下。農民雜出精糧（如稻麥）購入粗糧（華北以高粱為主），甚至以一擔的精糧換取不夠一担的粗糧（註二）。所飼的豬，所產的雞蛋，大抵都無力自食，必將其出售，來換得其他生活必需品（如鹽、布等）。人與地爭食，所以無錢買肥料（註三）。人與畜爭食，所以乳牛既少，母羊便從吃豆料而打落吃野草的冷宮（胡查山西牧羊狀況所得）。農民食料營養，尚且不夠，衛生醫療，更談不到（註四）。中國人體力不如飲乳民族，乃是一極大的問題。

與每人故數同其重要的是每故產量。農學專家告訴我們：從（一）改良品種，（二）減除蟲害，（三）充分施肥三大途徑，可以增高每故產量，較原來的增加二三成。假如這話確

有把握，便是新神農的福音。中央農業實驗所的工作，是值得我們十分注意的。但從經濟觀點，我又深深的感覺得我們幾千年的實驗農業，在牠人稠地穡窮苦的小農制及其所造成的惡劣環境之下，早已推往無濟，成了靜止的平衡狀態。此後的推進，當然要靠科學的種種轉推廣，可是推廣新種的工作，在頭及這樣惡劣的環境，沒有資本，水旱不時，肥料缺乏，這地蟲害的惡劣環境，用一舉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這所推進的方法，才能順利推行。初期所介紹的新種，在必要時得某種惡劣環境的補助，方才站得住（註五）。

每人耕地減少，為窮苦的原因，導致產量不足，為窮苦的結果，惡轉相持，遂造成小農制農戶亦不能積聚，農地甚多而難改進的現狀。作者曾旅人湖查平漢沿線農村狀況，當時調查隊自豫而入河北，且見豫南農戶，定天吃飯，一遇沙河，定天渠井灌溉，不懂甚麼緣故。翌年作者親到石家莊，再談此種當今農戶周鳴波。他說河北在二三十年前植棉尚少，亦未有井，其後棉產日增，收入漸裕，乃相率鑿井，一井以一盤曳水車，能灌溉二三十畝，數井並建成一區約百餘元，這算資本，乃因改種棉花才能積下來的。我們知道改進農村經濟，安從（一）增加農戶資本（流動資本如肥料等等，固定資本如器井等等）和（二）推進商品作物化而條大路上去尋求的。要達到這兩個目的，又必安從（一）增加每人耕地畝數和（二）發展交通而條大路上去尋求的。小農制的農戶，首謀糧食之自給，次謀收入的增加，再從極力推節，才能增加些少資本，以資農事的改進。必要有便利可靠的交通，農民才敢

故應多種商品作物，來增加他的收入。華北有了鐵道交通，關外（東北）口外（察綏）的高粱臨時可以移濟，所以河北、魯北、晉南、閩中成爲棉花地帶，魯南豫東成爲落花生地帶，淮河流域及豫南成爲豆麥及芝麻地帶。倘若購買力另有自來，則仍願多種穀物，以備災荒。（河北南宮縣莊家有言）在外謀生，有錢寄家，多種打伙，回鄉做活，種些棉花，計點入息。」

所以無歧的我們必然要從增加每人耕地畝數來解決農行的基本問題。我們要從（一）平常化，（二）墾荒，（三）開發邊疆，（四）南洋無限制的移民這四大途徑，來吸收農村過剩的人口。從合理化的人口政策，和優生法律，來改進民族的素質。作者因要明瞭華北農村經濟的基本狀況，曾作平漢沿線鄂豫冀三省的取樣調查。調查的地點三十四處，農戶一、六九〇家，人數一〇、八二一，畝數三六、四四一市畝。全線平均每人畝數，自耕農三、三，半自耕農三、四，佃農二、九。每人年產穀物二、七市石，如冬夏兩作全種穀物，則二、七市石需地一、八市畝，這是沿線取樣調查的結果。沿線農村人口或者比較交通不便的地方要稠密些。但此外作者曾在浙江南崑山上海附近地帶，其平均每人畝數，亦在三市畝內外。假如我們試以每人三市畝計算，他祇有一、二市畝的產品可以出售，於支付工料納稅納租之後，剩作自己的購買力的部份，實在太過微薄。如果每人畝數增加到五市畝之後，便可以有二、三市畝的產品出售，於支付工料的稅納租之後，剩作自己的購買力。可是這樣的改進，使

是要來從農村原有入口每萬人中，將四千人遷到別處，或改就工業。我們試一想我們是號稱四萬五千萬人的大國，那末應統數出來人口的數目，真令人眩呆了。然而每畝產值不過數元，縱有驚天動地的大疏散，而農民生活的改善，並非了不得的。既然如此，倘使最大多數的農民，他們的生活不能改進，則（一）國民健康，（二）教育普及，（三）民主政治三個極大的基本問題，都要受莫大的牽累。我願在虛談的請求肩負經濟建設的人們對於這一點增加每人耕地畝數——十分注意，政治經濟外交一切的國策，都要統統着這一點來着想。

三 耕者有其田及產銷合作社

在拙著「建立中心力重來保證民主主義的實現」，作者所想像的農業制度，係自耕農的中產化，和以農產品別的團營公司，從把握關鍵市場價格來確定農民的實際所得。國人對於合作生產式的集體農場（如蘇聯之模型）亦甚注意，我以為這是值得在每省於最能代表該省農產狀況的地帶，設立三幾個集體農場，慎選人材，主持其事，加以最嚴格的試驗，然後這樣的組織，在技術上，園情上，是否適合，這樣的制度，是否能逐漸的，永久的代替分戶自耕農的制度，才有正確的答案。我們依着國父的遺訓，無疑的第一步的大改革，是實行耕者有其田。時論對於實行這個遺訓，有偏向溫和和耕法的趨勢。例如由國家備價收購地主們的田地，或加重地稅，迫使地主自願放棄土地。作者對於這樣溫和的耕法，實有無限的懷疑。

余新縣制作基層政治的建設，為既定的國策，管教養衛為新縣制的四大要政，而保甲制度又為新縣制最基本的組織。在平時的時候管教養衛，在抗戰時期的徵兵徵工徵實，保甲長成為上令下達的必需工具。譬如電話的分機分戶一樣，沒有他一切都呼為不動，鄉村間能夠號召得動的人，知識字能夠奉行上面的文書政令的人，十之九必定是地主階級以及他們的子弟。所以保甲長大多數都是地主，這又是無可辯言的事實。因此鄉村裏的地主半半的把握着基層政治。同時鄉村裏半半的借債，農產品的加工和販出，必需日用品（如鹽、布）的採購和運入，又大抵皆係地主們所經營，因此鄉村裏的經濟動脈，也半半的被他們把握着。他們既然把握了整個鄉村的活動，所以沒有他們，便政令空架，經濟停頓。我們雖然盡量擴張農貸，積極的舉辦合作社，放新鮮空氣到農村裏頭。但到現在為止，這種新運動的質和量，離開改造農村的境地，還是十分遙遠。最主要的產銷合作，是要余經濟流通的新途徑來代替舊經濟的組織，生產者有了自己的出路，地主階級把持農村經濟之樞紐，便可敲碎。無如產銷合作的組織，還是空若虛星。現在的農貸和合作事業，因為地主階級的存在，有無走樣，地主階級是否伸出手來調着槓桿，使其不能照原來用意直達生產份子，作者沒有詳細調查，不敢臆斷，還請主得農貸和合作事業的人們指教。假如照新縣制的推進，縣長實行民選，而鄉村間的保甲份子依然是地主階級，將來所選的縣長，必是他們所推出的份子，恐怕要給機會與他們進一步把握全縣政治呢！現在縣長由上面派委，尚可驅策他們，民選之後，情形便不

同丁。

我們計劃地方政治的建設，必要從整個農村經濟狀況的觀點着想，我們計劃農村經濟的改造，必要從發展真正民主政治的觀點着想。假如我們不剷除地主階級，我相信真正民主政治不會實現的。假如我們不建立生產份子的產銷合作機構來代替地主階級的把持，我相信真正民主政治不會發展的。民權民主兩主義的密切聯鎖在農村之內。兩主義的順利發展在新縣制和土地改革產銷合作的密切配合。不論政治也好，經濟也好，一切的推行，都要靠讀書識字的份子，而鄉間讀書識字的份子，大多數必然來自地主階級。農民不論自耕佃耕，他們的生產太窮苦，沒有錢讀書，他們的生產活動，不需要讀書，所以總是趕不上地主，而讀書識字還成爲地主階級的特別權利。我們要使讀書識字的機會均等化，祇有一口氣把生活拉平。一鋤頭把地主剷除。假如用溫和的辦法，必定曠日持久，夜長夢多。等到實行縣長民選而地主尚未剷除，基層政治必然的被他們牢牢的盤據着了。

因此我斷然的主張積極推進產銷合作的運動。在產銷合作未能代替地主把持農村經濟之前，縣政不能民選。等到產銷合作能夠勉強把持着農村經濟流通，便應毅然決然的一鋤頭把地主剷去。所有佃農都依舊耕着原來所佃耕之田。國家發行二十年付息不還本的土地公債，分給地主，照原年的租額之一半或三分之一，變爲公債息額。如此則地主的生活也有着落，如租額之半或三分之一超過每年三千或五千元（戰前幣值），其超過部份，一概不發公債

，公債發息以二十年為止，如此則地主有很從容的機會，另謀生路。這樣的辦法，再溫和不過了。

剷除地主的時候，社會絕不免騷動，縣政府命令的下達，總不免有脫節，這樣的犧牲和代價是不能避免的。我們要有革命的精神，不能姑息。

四 國營農產品別公司及國家經營主要農產的國際輸出

我們如要確定（一）農民的所得和（二）動員農產價值之一部份使之資本化，必要設立國營農產品別公司來把握着農產運銷的關鍵階段。我們有了這樣的機構之後，則（三）調節供需，（四）穩定價格，（五）指導生產這三種極端重要的副作用，便可順理成章，六恐在手的跟着發生。而國家經營農產的國際輸出又有了現成的基礎機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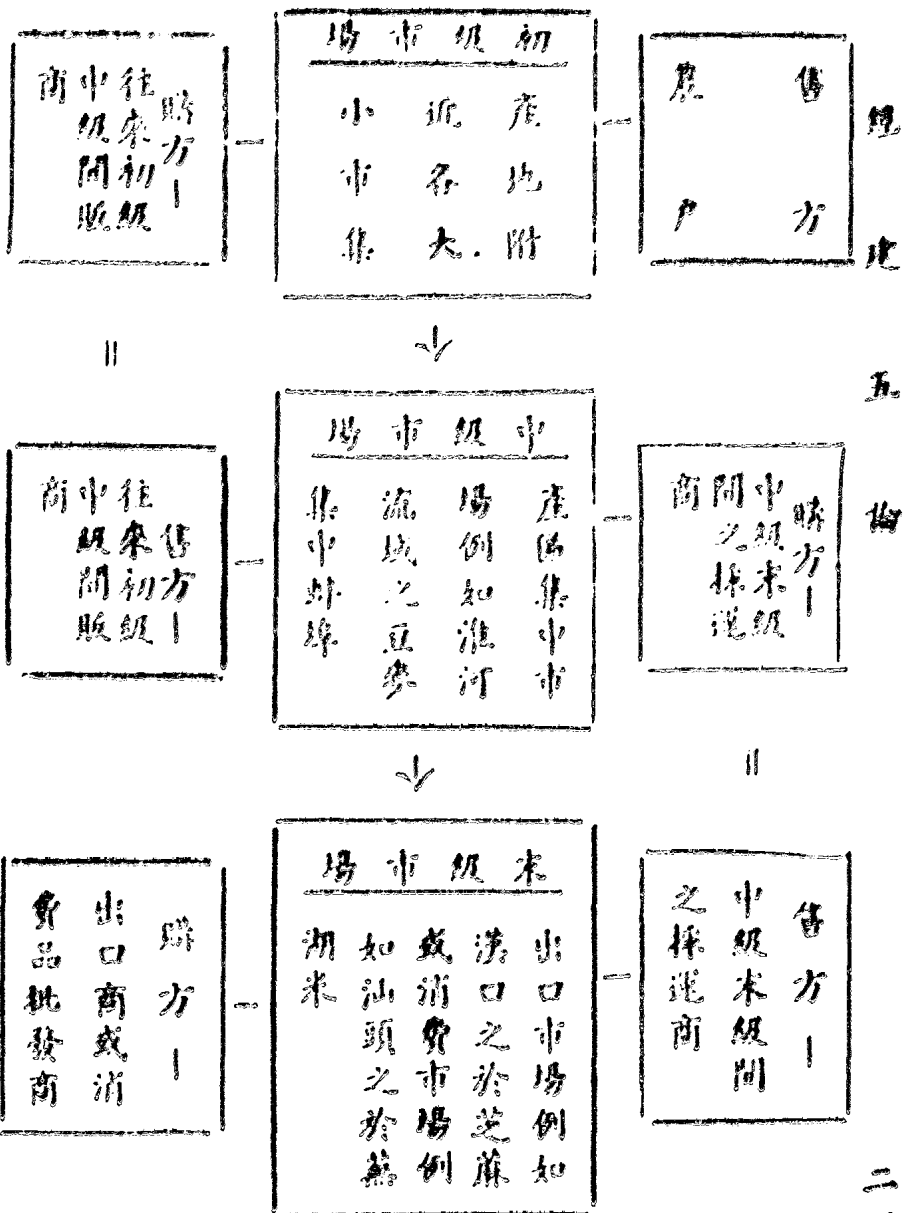
這樣的建議所要組織的公司，和每個公司所需要設立的分處，驟視之似乎多得不得了，但其實不然。第一、我們要問有幾種農產需要這樣的組織。第二、我們要問農產運銷的關鍵階段在那裏。隨着關鍵階段所在地設立分處究有多少。前面已經說過：在華北方面，穀物之外，主要的商品作物便是棉花、黃豆、花生、芝麻幾大宗，加上華南的絲、茶、蔗糖、桐油、菓子等，便包括了十分之七八了。我們試再檢閱海關農產品的出口。

品 別	佔出口總值%
茶	二·九
黃豆及豆油豆餅	一八·七
棉花	三·〇
花生及生油	四·一
芝麻	一·七
麻	〇·六
桐油	三·四
生絲	一二·九
蛋、蛋黃、蛋白	五·八
綉縐	一·一
共 計	五四·二

由此可見我們所設設的公司不過十個。(其實可將花生、芝麻、黃豆、加上菜子併為一個)再加上一個糧食公司，便把主要農產完全把握住了。

農產運銷的關鍵階段在中後市場，農產的產銷歷程，大致如左圖：

作者調查過華北各種主要農產品的運銷，主料過華南米業公司，深知道每品的主要中級市場不過十幾個，當時主料米業公司便抱此宏願，希望建立一種模範機構，以為收歸國營的資本的從農戶到公司所把握的中級市場，要發展產戶的運銷合作機構，從公司所把握的中級



市場到消費市場，要採取着原有的批發及零售機構。初級中間的販商，大抵為地主或由地主均變而來的專業商，我們將產銷合作社來替了他，那末農產價值之一部份，原來成為販商盈利的，便可歸諸產戶。把國營農產品公司代來替中級末級間的採運商，那末農產價值之另一部份，原來成為採運商盈利的，便可歸諸國家。所謂農產價值，自然指末級市場的售價而言。國營公司的盈利，連同國營農產國際輸出的盈利，便可撥歸國庫來辦種種建設。如此豈不是動員了農產的一部份使之國家資本化了嗎？（一）這部份的盈利與（二）稅收，（三）內外債，以及（四）國營工廠的盈利成為建設資本的四大來源。國營公司既然把握着關鍵的階段，建樹了獨佔的力量，自然可以拉平了全年價格。其在已往，農產上市時，農戶急於脫售，以求周轉，則市價就因而低落，青黃不接之時，存貨日缺，則市價步漲而傷民，這種弊病當然可以掃除。至於從加強國防自給起見，我們也許要增加糧產，從紡織原料充分自給起見，我們也許要增加棉產，我們便可把糧食和棉花的收購價定高些，來激增其生產。假如生絲銷路必然被人造絲剝奪的時候，我們便可將收購價定低些，來減少桑地畝數。因此指導生產的作用，便可以實現了。

五、農林部高度科學技術化，各省設立農政廳

農林部需要高度的科學技術化，來負起新神農的領導任務，是很顯然而不必多加論列的。至於省方的機構，實應設立農政廳，使成為各省最重要的經濟行政。農業既為民間生產，

所以農業的推進，必在親民的縣和管轄的省常他做中心工作，方能實現，更是明明白白的。比之交付於各省設置官廳，實在祇是工商部的附屬品，主要工作在辦理公司註冊，商標註冊，礦區領照等事項。國民政府建設廳，其初為公路處之擴大，其後乃無所不包。廣東在半獨立的時代，揮散開礦，一時有形成省本位經濟的趨勢（廣西山西亦曾有此趨勢）。交通工礦的建設，要中央舉辦，就全國的需要來規劃的，要集中人材來辦理的。而且我們要統一的局面永遠穩定，決不應擁有雄厚的財源。現在因為有了社會部，各省便設社會處，有了農林部，各省便設農林處，其地位次於廳，其主管長官並非當然省長，祇列席省府會議。我們是不應該設許多新處，乃另一問題。但以農業之重要，乃僅設處而不設廳，似乎輕重不太適當。農業重在行政，交通工礦重在事業。事業擁有雄厚的財源，應歸中央。行政要貫徹下達，應由省方負最大的責任。

（附註）

（一）鄒子尹詩：「燕高競墾山，黎平競樹木，樹木十年成，墾山歲雨熱，雨熱利誠速，獲飽必逾年，十年亦紆圍，綠林長金錢，林成一旦富，僅忍十年苦，耕山見山骨，連年亦約取……」可是極端窮乏的農民，便沒法「僅忍十年苦」。

（二）天津麵粉廠每年放船裝滿開外高築到臨濟大名一帶購麥小麥。當民國二十二年世界經濟不景，農產價格跌跌的任潮提到中國農村的時候，國麥受洋麥跌價的壓迫

，農民定願拿一些多的小麥換一把高粱。因為小麥好吃，很容易吃得太多，糧食便不夠終歲之用，寧可換取比較粗獷難吃的高粱來度日，可憐之極。

(三) 平漢沿線農村經濟調查一區君厚昌報告如次：農民收入，除耕作外，多喂雞飼豬，補助家用。養豬多屬大戶。人口太少如一二人者則僅喂雞耳。因鷄食草子小蟲，燕雀飼養即可。豬則食量大，食不飽則不能肥。人尚不能一日得兩餐，更何有餘糧喂豬。故必須人口多者，方有廢食廢料，將洗鍋刷碗之水，滲以乾糠，作豬之食料。養豬十個月，可長一百六十斤，豬每斤按一角二分計算，則合十九元二角。故一豬一年，年約可值二十元。養豬之處口闊，有挖開坑圍砌以磚者，有用柴草圍築者。草編成皮，織土磚房，俱傾入圍內，吸豬糞便，即成肥料，可省購買肥料之費。

(四) 新聞前登，生油發熱，用急白豬油炒一大碗飯來吃便愈，平時勞苦不足，有病祇宜吃些豬油蔥白湯充體力來抵抗疾病。此亦為調查平漢沿線農村時所獲得。

(五) 江西鐵路保安衛隊附設農事試驗場，試驗江蘇種稻，種稻收穫較本地種稻遲兩三星期，恰到天氣較寒熱氣大減的時候，將其食盡。本地種稻收穫較早，避了寒風時期，所以能生存。

定縣試養去後大豬，需之費當五料，所以這「養豬精」不能推廣。

三 工礦業

上篇 建立新工礦政策的兩個先決問題

一 抗戰前工業化的檢討

自一九一八之後，亦即革命統一團體完成之後，我們的領袖要積極開發抗戰的資源，設立資源委員會主持其事，然後還有團營的重工業才有了新基礎。前于此的國防建設，清末曾在李鴻章的兵工事業，造船製鋼事業，雖極規模，以言運動，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迹。自清末一直至抗戰之前夕，數十年來，中國工業化的動向是在次殖民地式自由經濟之下，循着資本主義（私有私營工礦），和根據下關係的帝國主義（外商設廠）兩條主流之內，漸次的發展着。從甲午至辛亥，為列強瓜分路礦時期，開辦及福公司兩大煤礦，即為此時期的遺產（法界前開內年產煤一千二三百萬噸，其中開辦便佔四百萬噸左右）。帝國主義瓜分路礦的動向，在國內舉着第一次歐戰及九國公約而正式消滅，但國外則淪為日本特殊權益的區域。從辛亥至一九一八統一成功，於這年內戰的擾攘環境中，主流的工商業依附著沿海沿江的租界和外國商輪所達成的經濟據點和交通網，而逐漸生長。這個經濟關係以上海為中心

，南北兩洋乃是江蘇與浙江，成爲我國主要經濟動脈，則內的運輸比較鐵路網的運輸大得多。在這期內遇着歐洲大戰，來貨缺乏的外賜原因，在這網內的輕工業得了一度的突進。至於網以外的情形怎樣呢？我們一看華北鐵路沿線的煤礦紗廠麵粉廠等等，大抵皆受內戰的牽累，若斷若續的踉蹌顛頓着，便知道此期內的工業化係在次殖民地式自由經濟之下而草息，並非過言。華中的南通無錫，不論其一爲有理想的實業家所構成，一爲上海模型的分枝，然而都因爲不在軍事地帶，才能發生這僅有的例外。抗戰前夕的三幾年，內地的工廠，雖逐漸蘇復，但一面受近年積欠債務的拖累，一面受津滬大源關稅大礦侵蝕競爭的壓迫，祇能於所在區域之內分法局部市場的餘瀝來掙扎着，實不至進向「中原問題」的雄關（「中原」在上海一）。至於現已成爲工業重心的上海，固着於地盤，爲「匯兌轉接之中樞」，資金集中之總匯，是戰期用款，均有左方匯兌之優越，其交通貿易網，結成全國經濟動脈，有左顧右盼之廣闊，國內外原料供給之充裕，國際市場發做之便利，再加以廉價動力，大量技工，與夫碼頭倉棧種種設備之完全，在自由經濟的形態下，不但保持而且加強其特殊優越的地位。所以以紗廠和麵粉廠而論，其生產能力的利用（即實產額與能產額的百分比），內地遠不如上海。全國年產麵粉七千二百萬袋，一半在上海，全國五百餘萬的紗錠，一半又在上海，而這五百餘萬紗錠却又有一半屬於日本紗廠，集中於上海青島，其技術與效率，業將與財務，均遠較華廠爲優。大而言之，在企業競爭上，外國商廠壓迫中國商廠，而租界商廠又壓迫內地商廠，

稱之為次殖民地式的自由經濟，更非過言。不論十分重要的日本紗廠，與不大重要的英美烟公司，皆係由商而工，利用中國人工原料，「移樽就教」，為變相的國際輸入，更顯着次殖民地特性。

假如沒有抗戰，次殖民地式的自由經濟是不容易打破的。現在英美兩大盟邦已經放棄了租界以及內河航行沿海貿易等特權，不久要重訂新的通商航海條約。至於友邦所轄的工礦企業，深信自可依平等互惠的原則，以及合乎我們經濟建設的國策，圓滿的加以調整。日本在東北的鐵道和工礦，在上海青津的紗廠，戰後自然要放棄。淪陷區的工礦，到了收拾舊山河的那一天，殘破到怎樣，誰也不能預料。此時施展我們新的工礦政策，仿如一張白紙，任從我們向大處落墨，然而墨淡交流，又必不在意外。雖然自動自決的建新工礦政策，真是禹甸重光後千載一時的機會。而同時又必是十分艱辛的事業，箭向紛紜的爭端。我們萬萬不可辜負了這個千載一時自動自決的機會。已往工業化的趨勢，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去，是無可諱言的。這個已成的趨勢，有深厚的社會基礎，有法律的許可，有富有活動能力的受益份子不斷的將其推進，不斷的尋求種種理由為之辯護，他們能以優厚生活，事業機會，甚至東床快選來吸收人才，能運用他們的財力與人才來擴張他們的事業，的確是富有生命力富有動力的已成趨勢。我們知道歷史是有延續性的，已經發生的勢力不會自動取消的，已經形成的箭向，不會自動易轉的，所謂「一頁雷聲未至」，我們絕不能小看這已成的趨勢。另一方面

，國有國營的工礦事業，高潮尚短，還沒有成效大驗，使社會輿論，翕然無異議的將工業化的重任完全付托與他。經濟建設的時機快成熟了，多年來大家眼巴巴的望着樂園裏這個禁果，誰不「磨扇以扇」呢？「有飯大家吃」的社會習慣，如再加之以「不顧一切來實現工業化」，（*Without regard to anything*）的呼聲，假使這個呼聲又能夠壓倒一切，必然將中華民國送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火藥庫裏去。羅蘭夫人疾呼道：「自由，自由，世界多少罪惡假藉了你的名義！」所以個人一定要說：「方向重於進度」，而決然反對「不顧一切來實現工業化」！

二 此後工業化的最中心問題

多年的次殖民地式的自由經濟，再加以國步艱難，在有些人們的心目中，養成了兩種自卑的心理。他們如果聽見外國人說：「甚麼事情交回中國人辦便要糾纏」，如果有時聽見成功的企業家說：「官辦實業那裏行」，這些自命為深明世故實事求是的人們，對於這些論調，雖不公開贊成，常會默然首肯。我們不能不承認，假如沒有多少事實為之左證，自然不會有這種論調發生。同時我們又想到「國父提倡革命的時候，自命為深明世故實事求是的中西人士，亦常有詆毀他為「做夢的人」的。惡意的，利害衝突的，煮硬了的（*Hard-boiled*）詆毀者，不必論他。其善意而輕視的究竟犯了甚麼毛病呢？他們的深明世故，實在是過於重視

一個時期一個階段的序而事實，而是不見世故有河山易位的滄桑，潮流有新代劃時的變動。他們錯認了一時的行為勝於為悠久的人類性格，他們向一時的序而事實屈膝調協，落了「明度以寡救衆之末，而不見與新」的窠臼。現在當然再沒有說「國父係「做夢的人」，也決不會怕租界交還之後我們解不好，而反對中英新約中英新約了。可是「官辦實業那裏行」，與不公關於論理，當會驚譏於私室。私室時以「官辦實業那裏行」的人們，很可能的會在輿論上主張「不顧一切來實現工業化」。

我們可以常常聽見種種論調：（一）資本太大或者無利可圖的重工業，因為又是必需的，應由政府舉辦，其他的——尤其是輕工業——可以民營，或者應歸民營。（二）如果民營工廠可以隨時收回國有，誰肯辛辛苦苦去創業呢？雖然依法辦理，借債收回，也是得不償失，這樣的威脅，徒然使企業家裹足不前，不如確定民營工廠的種類，動員民間的力量，讓他們安心放手做去，而收聚學易成之效。（三）政府自己辦不好，或者包而不辦，妨礙了工業化，要不得，應該開放給人民去辦，祇要受國家法令的統制，企業進的所得稅來節制資本便可。（四）國營事業受複雜防弊的法規所縛束，沒有效能，失時誤事，浪費，不認真，大家做官不做事，成本之低，效能之大，那更趕得上私營企業。（五）德國的效能最高，私人企業受國家統制，比蘇聯的國有更高明，我們學德國便得。（六）我們要獎勵民間的自發自動，養成民主自由，企業進所停頓，生命保險，並且由國家多辦些公共文化教育衛生，這便可節

引資本，修定民生（一七）後方的失業工礦有不少的受困志士技術專才企業家才冒千辛萬苦來幫助去撥抗戰，成績斐然，將來不是一樣的可以努力建設嗎？戰時既然是生產第一，戰後便是工業化第一。

總而言之，說句實話，這後論期共同的意義是：為私營企業留個廣大的園地，讓他繼續增高，不是過信政治能力（如主張統制）卻是不願將工業化的重任之最大部份付託與國有國營領域。民生主義既已定的國策，而工業化近代化又為迫切的志求，於是經濟建設的前途，他成了一樣看成績看直成事「的幻境了。

我們現在試作幾種根本的分析：

一、民間自動自發的能力和利潤的進求不是發達實業的必需品，並不須我們白費唇舌，事實勝於雄辯，蘇聯的偉大成就，應該可以思味。假如有人說「*the state is the only way to build the country*」，不是更卓越嗎？不信，假如沒有全力爭取勝利的社會大氣籠罩一切，*the state* 奇不了，*the state* 誠然是個大發動機，但並沒有否定史太林是個更大的發動機。假如又有人說，要學蘇聯，必須全盤學的，不能斷章取義。這樣的論調太過理論了。我們應該問：不將私人資本剷除淨盡的國家，能否把國有國營的事業辦得好。

二、任何實業的發展，是必有適當的外賦環境，有些還要保持專利的權利，並不因其為國營或私營，工業落後的國家需要保護關稅，或者國營國際貿易，這是誰也知道的。礦區的取

得，保息的補助，專利的立案以及財部免稅鐵路專債等等，皆屬於特等的權利，他如社會的安定，原料的把握，市場的接近等等，又為一般必需的條件，凡是屬於經濟理論上所謂「租」(Rent)的性質的條件，換言之，特殊的優待條件，使其有超過放款收息之利可圖的，不論其為法律所賦予或環境所賦予的，實為私營企業所必需的要求。在資本特別缺乏的社會，完全競爭的生意總是私資本所不其追逐的。我們現在脫離了次殖民地的桎梏，是全民抗戰犧牲得來的，這個發展實業的空前機會為甚麼不歸諸國家而讓給私人呢？種種屬於「租」性質的特殊權益，為甚麼要批給私人，又從而稱頌其自動自發的能力呢？除却承認「官辦實業不行」，實在沒有圓滿的理由了。

三、庸才與幹才 實業 近代大規模生產 需要大規模生產的技術和運用大規模生產的組織。有這種技術能力的工程師，有這種組織能力的經理人，可以稱為幹才。有他們認真痛快的去執行職務，實業才能辦得起來。不論國營也好，民營也好，這種業務份子是一定要的。我們能夠說他們一人因營領煤便一定縛手縛脚的完死了嗎？潛移默化的腐化了嗎？除非我們承認國營事業必然的完死了腐化了這些必需的業務份子則已，否則便沒有正當理由來主張以上的七種論調。有支配熱的雄心，運用着縱橫捭闔的手段，敢作敢為，好戰好勝，集教不別的一秀傑天民」，可稱為庸才。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實業大王，多屬於這類的怪傑。所為庸才者，以其無若者私有企業，豈真了生產「神云」，來作威作福，左右政治，這其一

己之私，其於國民社會革命，固係戰爭。我們爲什麼要擴大私營企業的圍地，而使獨才獨能生心以造亂源呢？我們爲什麼要受國民間自發自動的能力，讓這些怪傑來奴役那些規規矩矩的奴才呢？所以個人主張私營企業，以反正做不大的生意爲限，正所以杜絕他們的觀望生心。假使圍地擴大之後，這些怪傑的霸業已成，包管你沒有法子節制資本，而爲資本所節制。數十年來，工業的現境不好，其中縱有獨才，也不易興雲作雨。企業界中有由商而工的舊式商人，洋場買辦，及辱國辱僑，有由官而商取得特權的（如礦區或公用事業）有面子的官紳，有志在發達實業的讀書種子。我們不論怎樣，總不能再依附陳腐學說，替進退利潤樹植勢力的份子張目。惟有事業心發熱心的企業家，孜孜不倦，逆水行舟，歷盡艱辛，來創立新工業，值得我們重視，對工業化真正有貢獻的也只有他們。國際達到平等，國家有了安定，經濟建設時機已經成熟的時候，國有國營的事業，更足以展其驥足，舒其抱負。若謂政府事業，縛手縛腳，爲他們所不願不顧，那更是顯然說現時制度有改良之必要，而不能說私有企業爲推進工業化所必需的工具。

所以從種種方面分析下來，工業化的重任並不一定需要私有企業來收舉繁易舉之功，避免包而不糾之弊，一切觀點，一切論點，實在都集中於「國有國營事業如何才能辦得好」這一個最中心的問題。果然辦得好，有了成效大驗，觀聽自然丕變，羣疑自然冰釋。我們要肩負起循着民主主義的途徑來實現工業化的重任，一定安「把國有國營事業辦得頂好」，來解除

懷疑者和反對者的武裝。

這個問題，個人認為是建立新工礦政策的最先決最迫切而實在的問題。現在國有國營的事業，老的有鐵路郵政電信，比較新的有公路工礦，政府應該集思廣益，認認真真來策進他們的改革。現在的預算會計審計等制度及其實施，會計營業用款用人等等之監督與投報，計劃之設計，成績之考核，服務人員之報酬保障及獎懲，關於這種種的現行法規利弊如何，實際狀況到底如何，應設一考察諮詢委員會去切實檢討，制為方案，以收博訪周諮實事求是之效。個人認為：（一）紀律化與效能化，並為根本的衝突，所以國有國營的事業絕非先天的不如私營企業的有效。大概現在的缺點，在應寬的不寬，應嚴的不嚴。（二）人事制度不但要能夠使得人盡其才，並且要能夠吸收最優秀的人才。所謂人盡其才，係要使得人人能夠認真做事，不必打做官的算盤，安心做事，無恐想後頭的憂慮，放手做事，不受縛手縛腳的窹氣。所謂能夠吸收最優秀的人才，係要使這些人樂向國有國營事業去建功立業，而不向私營企業去謀發展。

三 和平革命

從次殖民地的經濟轉到自動自決的經濟，係經過國民革命長期抗戰重大的犧牲得來的。沒有重大犧牲和代價，不會有旋轉乾坤的成就。我們已經說過，歷史是有繼續性的，已經發生的勢力不會自動取消的，已經形成的新向不會自動揚棄的。我們對於已成的趨勢——以往的工作化係在資本主義的時局內進展着的趨勢——可以沒有鬥爭和犧牲便能取消嗎？這正真是

國父民生主義的精華。他正因為中國工業化的程度尚淺，可以用科學未熟的方法來避免階級鬥爭的病理之發生。他要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衛生道理，用發達國家資本的自然生理，使社會本體健全發達，所以他說自己走社會生理學家，而馬克斯是社會病理學家。所以民生主義是和平革命，是社會主義的實行。他明明指出了實行的三條大路給我們，但我們必要有實行的方法。我們要發達國家資本，必要從「國有國營的事業辦得頂好」做起，我們要節制資本，必要從建立節制資本的決心和意志做起，要建立這樣的決心和意志，必要從黨員與一切生意絕緣做起。假如你也有一門生意，我也有一盤生意，你我各自都要發達所有的生意，那裏還有節制資本的決心呢？所以個人主張確立黨員的行誼和生活保障制度，行誼上他要與一切生意絕緣，生活上他要有合理的保障。這一點，個人於一建立中心力量來保證民生主義的實現」一文內，就是要確立這樣的行誼和生活制度。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黨員行誼和生活制度，係節制資本的大本。大本一立，其他順序推行，便如六書在手。若照現在其他的客觀條件而言，節制資本的最大武器，已操在政府之手。這就是說活動資本的絕障——四行——已在政府之手。抗戰後在事業的恢復，新事業的發生，都要大量資金。而且抗戰後金融必須經過一度根本的整理。所以如何運用四行資金，如何根本整理金融，都是實現民生主義的最有利的利器。處建紙之勢，居而臨下，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又是孟子所謂「聚有智慧，不如乘時」的時候，雖然，我們要先立大本，要黨員與一切生意絕緣來齊步後統一意志。和平革命，是否可能，將於此卜。

下篇——工礦業國營民營領域應如何劃分

抗戰期內，生產第一，務要能夠增加生產爭取時間，不論國營民營，毫無計較。抗戰結束後，淪陷區的工礦，急待恢復，大後方的工礦，急待調整。關以內的淪陷區原來已有五百餘萬的紗錠（其中二百餘萬係日錠），年產七十二百餘萬錠的麵粉業，年產一千數百萬噸的煤礦，以及其他廠礦，而東北則接收的敵營廠礦，如本溪撫順，規模尤為宏大，經過長期抗戰的破壞，剩下來的機器和設備，必須另籌巨額資金，方能修復。大後方的工礦業所採用的製造法，多屬簡易而不經濟的舊法，其設備又多為七折八湊就地取材的急就章，戰後大抵不能立足，而尤以煤焦造鉅的小型鋼鐵業為甚，至於桐油煤油汽油的工廠，更屬祭餘易狗，然而在進過程中所發生的技術部門和組織經驗，應使其在戰後的工業化繼續盡其貢獻，所經營的資源，如在質和量上仍能合乎經濟條件繼續開發的，應就已有設備分別存法，根本擴充，這樣的大調整，又必須另籌巨額資金，方能辦事。凡此種種，由誰出錢，錢借給誰，將為戰後立須解決的問題。因此工礦業國營民營的劃分，首先要有一個合理的規定。

民間企業界所希望的，第一確定民營範圍，他們可以安心放手來經營這些事業。第二所定民營範圍，愈大愈好，多多益善，有現成而廣大銷場的工業業，都是有利可圖的，最好完全劃歸民營，官不實不進任而進行私私製的，儘管讓政府自辦。可是政府肩負有兩種極重大

的責任，第一建立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第二高程度的實現工業化，這兩種責任同其重要。不可顧此失彼，物質進步與制度邁向，應相成而不應相反。

有些人認為中國沒法不到甚麼資本勢力，不必認真過慮，「稍勞伯有」，不必即行節制資本，反致妨礙生產。我們試一檢討戰後產業大動靜便知道這句話是絕對不對的。中國的工業化在第一次歐戰期內，因為來貨缺乏，供不應求，發生了填充的作用，曾有過一度的突進，其後的退度，又復趨緩，因為直至抗戰前為止，產業界受着三種壓迫：（一）關稅雖已自主，但因中日關稅協定，主要產業失了保護，所以自主變了有名無實；（二）日本根據下關條約，透過關稅保障，於上海青島天津廣設紗廠，華廠普遍的受其壓迫；（三）各廠礦或因連年戰事的損失，或因物品投機的失敗，（美棉美麥的投機）或因經營的浪費，結果負債累累，財務成本加重。此後（一）（二）兩種壓迫將隨抗戰勝利而消滅，第三種壓迫又因貨幣幣賤而銳減，因此企業的前瞻，已到大地回春的好景。在求的方面，日用品的購買力，大體來自農村，經過兩三年的安定和豐收，很容易完全恢復，建築材料的需要，則因被兵各地的道路宅舍都要做必要的修復，必然發生空前的景氣，如政府再發動大量水利交通及廠礦各種新工，其需要的銳增，更不可以道里計。而在供的方面，原有之生產設備已因戰事破壞而銳減，所以一切產業都發生填充的作用，其氣勢當十倍於第一次歐戰之時，再加以日廠取消，內稅收回，百廢待舉，在生產聯繫上，一業所需的原料為他業的產品，由是而甲業引動

乙業，乙業引動內需，一時春雷動雲，錦上添花，產業界必然發生空前的景氣。因此戰後五年實為經濟建設的空前機會，亦即為制度動向的最重要關頭，如將工業事業大量劃歸民營，則私資本制度堅固的樹立了強大的地盤，如大量劃歸國營，則國家資本獲得空前的發達，政府應抓住時機，雙管齊下，務使（一）建立制度與（二）實現工業化相輔相成。而且淪陷區廠礦的修復，後方廠礦的調整，新廠礦的建設，事事要錢，現在政府已經把握着國內資金總匯（四行），把握着國際投資的鑛鑰，決之東方則一流，決之西方則極流，政府要實現他的新工礦政策，可以說完全六實在手。

所以物資進度與制度走向，一定要相提並重。現在要進一步問：高速度的實現工業化需要甚麼條件？節制資本和發達國家資本，需要怎樣劃分工礦業國營民營的領域？我們可以很簡單明瞭的答復：

高速度的工業化 需要（一）國內資本和人力充分動員，國外資本和技術大量吸引，（二）每個生產單位絕對效能化，（三）各生產部門的產銷量要銜接配合，請奏順進，充分按照計劃而實現，（四）人力物力財力儘先多用於生產設備的建設，少用於消費物品的生產。

節制資本 需要把生產歷程中的關鍵階段，慎言之即有關鍵性的部門，劃歸國營，除歸民營，節制資本把握着產值上必經之路，由實業買賣，市場價格，外溢價格，來指

導生產，節制利潤。

發達國家資本。國家不能專辦資本週利無把握為民營所不願辦的重工業，還要兼辦利潤有把握而又有關鍵性的輕工業，然後能通盤籌算，按盈補虧，不專靠征稅和借貸的財政手段來解經濟建設。

茲根據這三個大目標所需要的條件，試擬議工礦業國營民營領域的劃分辦法，以及民營事業所應有的規定，計凡四項如次：

(一) 工礦業依其性質，分為三類：(甲) 具有獨佔性及關鍵性者，(乙) 具有關鍵性而無獨佔性者，(丙) 不屬於(甲)(乙)兩類者。

(甲)(乙)兩類採列舉方式，以法律制定之，如有增損變更，亦以法律制定之。(二) 屬於(甲)類者，完全歸國營，不得民營。屬於(丙)類者，人民得依照現行法令呈請註冊立業經營，不須特准。

(三) 屬於(乙)類者，其處理辦法如次：(民營工礦許可法) 以設備之生產能力計算，國營部份應為民營部份之若干倍，稱為「產力比額」，以行政命令核定及變動之，但規定比額之原則，則以法律制定之，產力比額之規定，所以維持國營部份之領導地位。在產力比額限度內，民營公司呈請特准後，得依法設立廠礦。

每一民營公司所有生產單位的生產能力之合計超過一定限額時，國家得備價收購之，該項限額亦以法律制定之。

(四)民營公司不得互相聯合，在生產歷程上，或推銷市場上，締結任何縱的或橫的組織。民生主義的精華，是要防患未然，要生產落後和資本勢力尚小的中國，於其踏進工業化的大道時，積極發達國家資本，擴大國營領域，來領導全社會的經濟，消極節制私資本，勿使其坐大；尤勿使其取得關鍵階段，增大地盤，來操縱經濟，左右政治。國父明顯的指出中國工業化所應走的理由，所以他說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實行。照着這條路由走去，工業化完成之日，便是社會化的理想實現之時，斷不能如一部份人們所想，祇求工業化，不必斤斤計較制度。戰後工業化的機會，既已十分成熟，我們當然要預先確定民營領域的限制。前四項所擬的限制，必有人認為不足，亦必有更多的人認為過甚。有些人一聽到限制民營，便不願耳，以為一加限制，便要妨礙工業化，他們覺得國營事業成本既高，效率又低，總比不上民營事業，好像美國漫畫所給的中國人老是帶着一條豚尾的。他們又覺得國家所能撥的建設專款有限，而應辦的工礦事業太多，不如盡量讓與民營。他們不但錯認了軍事支出，老是腰大十圍的巨無霸，而建設支出，老是蹣跚却步的小矮個，並且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老話也忘了。這句老話的新解釋是怎樣呢？在理論方面，我們知道國家的稅收和私資本的積聚，皆來自同一的源泉，今社會的生產，亦皆由國民所得，便是這個源泉。在實際方面，我們知道

中國最大部份的生產是農業，農產總值很可能佔了國民所得百分之八十，農產收成之後，除留供食用一部之外，不是餵的與地土，便是運於三個月後，通通售出。誰也知道農產價格是有季節性的，誰也知道，最苦的農民，得不到價漲的利益，地主和販商以及農產加工的製造者（如磨房粉廠油房紗廠絲廠等），如係出口農產，再加上買料和洋行合起來一共五種人，便分得地租和農產自農民脫手後所增的價值，除掉販運製造的開繳，便成為他們的利潤，再拿賺得的錢來辦貨設廠，這便是最大部份的商業私資本和工業私資本所由拼成的速寫。國家祇要辦三件大事：（一）實行土地改革，使得一部份的地租歸諸國家；（二）於主要農產品集散歷程中的關鍵階段設立國營公司（該關鍵之前後各段仍歸民營），使得該階段的販運和加工的利潤歸諸國家；（三）主要農產品的出口國營，使得國際貿易的利潤一部份歸諸國家。這樣一來，還怕國家沒有建設資金麼？從農業圈而迅速的進於工業圈，不外兩個法寶：（一）大借外資，（二）動員農產價值一部份使成為工業資本，前述三個辦法便是動員農產價值的辦法，祇要秋收好，不怕沒建設，這便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新解釋。

開頭已經說過，高速度的實現工業化需要四大條件，其中（三）（四）兩條件，尤須盡量擴大國營領域方能使其充分實現，鍊鋼采造鐵路製機器，便是從事於生產設備的生產，這都不是可以馬上賺錢的。所謂把人力物力財力多用於生產設備的建設，是說多過利潤經濟所能建設的意思，所謂少用於消費品的生產，是少過利潤經濟所必及用的意思。這樣反利潤經

濟的辦法，祇有國家通盤籌算，優盈補虧，方能辦到。既然採取反利潤經濟的辦法，祇有國家自行作主來辦，不靠保不保息種種辦法，希望人民去辦，才有按照計劃，銜接配合，順序前進的把握，所以計劃經濟必要靠國營方能切實推動。還有一點極重要的，就是全體性的效能。由於通盤籌算，各生產部門按照配合計劃而實現的效果，稱為全體性的效能，這與每個廠礦的個別生產效能，是完全兩個東西。個別生產效能係拿生產成本來計算，屬於技術的、管理的、價格的、全體性的生產效能係拿整個社會生產能力的進度來計算，屬於計劃的和經濟的。一般人習於資本制度，歌頌追逐利潤為減低成本增進個別效能的有效劑，而不知全體性的效能，乃計劃經濟之能事。這個全體性的效能，不惟與追逐利潤無關，而且各自為謀無從前進的利潤經濟，恰恰與之背道而馳。

最後，我們要答覆人才和資本全體動員的問題，關頭已經說過，艱難奮鬥得來的技術和組織的經驗要充分利用，戰後所需要的技術和組織的人才，其數額大得可驚，祇愁求過於供，不怕投閒置散。至於資本呢？有些人會覺得民營一加限制，使有許多現成民資，不能用到工業上去，這真是一種錯覺，關頭不是已經說過，淪陷區廠礦的恢復，後方廠礦的調整，都還要大大的視新資本麼？即就本篇所說的劃分的辦法，民營領域，依然十分廣大，那怕英雄無用武之地？而且資本動員的真諦，是說資本的使用要照着建設國策所定的燒烈重點來依次分配，戰後趕快恢復國力，無疑的是根本要關，而最直捷最快當最簡易的方法，無疑的是增加農產，全國各鄉村的塘埔急待興修的，不知多少，全國農戶因為缺乏流動資金，不能充分施肥的又不知多少，所以施肥和水利兩大事，已經有鯨吞虹吸的胃口，而這兩事又為增加農產的最直接快當有效可靠的辦法，中國此後低昂資本缺乏，不怕進資作怪。

四 交通

戰後鐵道交通所負的建國使命

一 概論

戰後鐵道問題，從實際的大事而論，有（一）限期修復各路，（二）建築第一期（戰後五年）各路，（三）更改鐵路管理組織，（四）整理鐵路內外債務，（五）釐定鐵道運價等等。從基本的政策而論，我們的經濟建設，要依照着以三民主義為制度，國防經濟為內容的總目標做去，具體言之，有（一）奠定發展全國資源的基礎（包括東北蒙古青海新疆西藏），使中國向自足經濟和大陸強國之途徑邁進，（二）特別協助重工業之發展，使中國於最短期內，完成其工業及其原料工業，換言之，建立兵工生產之全程，（三）以鐵道網與一切水陸交通配合，以水陸運價的全部配合，使經濟發展之分佈，脫離從前以海口商埠（上海天津青島廣州）為經濟中心的畸形，建立合於國防安全的工業重心，在可能範圍內酌採時賢區域經濟的主張，（四）以運價政策儘量調節民生物資的價格，使各地趨於一致。前五項的決事是手段，後四項的政策是目的，拿鐵道交通來建立民生主義的國防經濟，孰為手段，孰為目的。

是很清楚的。錫理曾說過，「交通為實業之母，鐵道又為交通之母」。概是說拿鐵道來發展實業，拿交通來發動生產，我們所要發展的實業，所要發展的生產，其種類和數量，其分佈和進度，需要怎樣的鐵道網？要怎樣運用這鐵道網，才能達成這個任務？我十分竭誠地向肩負戰後鐵道交通建設的人們建議，要念茲在茲，而不可僅僅拿實務幹材的氣派，一味從得通拜得快方面來自足。大家要認明交通建設是經濟手段，而非經濟目的。以前的運費政策，在理論上往往側重依照負擔能力來定運費（*Charge according to ability*），事實上又往往專從鐵道財務上着眼，採取收入政策（*Revenue policy*）。前者係資本主義下私有鐵路的生意經，後者是一各人自掃門前雪的不良現象，甚至路與路間，互爭生意，這種種糾紛，均要根本改革。交通部及財政部的分權劃界，尤其要不得。我們不欲建立偉大的中國則已，如欲之，則國家財政必妥為盤算。我們不欲做成整個的國民經濟則已，如欲之，則國營事業，不是通通都要賺錢。我們不欲鐵道交通完成上列四項目的，協助國防經濟的建立則已，如欲之，鐵道營業，絕不可以賺錢為目的，鐵道財務，絕不可使他掙扎於自力更生之下，甚至因此而不能擺脫外債債權之縛束。具體言之，對於戰後的經濟建設，政府和全國人士應一致的強調兩件大事：（一）必妥有一個具有實際權威的最高經濟會議，統籌全局，決定和督導全國經濟建設，（二）對於國營事業，應以所預定的具體任務，為考核標準，而不以賺錢為唯一標準。這是要求當局妥為宏遠大，通力合作，不要各立門戶，要求社會要有

見識，要有公道，不要利用一般的庸淺見解，以為賺錢便是成功，不賺錢便是失敗，去美國伐異，以成敗論人。

從目的和手段的關係而論，還有一點要特別提出的。總理民生主義標明（一）平均地權，（二）節制資本和（三）發達國家資本三大事。同時對於發達國家資本，又標明從振興三大實業着手，（一）交通——鐵道及運河，（二）礦產，（三）工業。國家資本發達之後，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國有國營的經濟領域擴大到具有決定性的地位，然後私人資本受國有國營經濟領域的外溢價格（即存在國有私有兩領域之間的各市場的價格之總稱）的控製，而得了節制。國有鐵道的運價，即為外溢價格之一。例如煤斤運價，即可以裁定各港煤私有煤礦的利潤，而收節制資本之功。貨運以農產礦產為大宗，以戰前情形而論，農產的轉運商，大都為中小級商人，不配和鐵路當局分庭抗禮，祇好低首下心，向那些與路員有關係的轉運公司鑽門路，故求把貨運得出來，運價之外，加付小費，彼此皆然，沒有那個便宜吃虧，到了出售市場，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至於煤礦呢，他們的董事長，往往係曾經當過部長的，他們的財東，又往往是鐵路債主的大銀行，於是國家資本的鐵路，和私有資本的煤礦，誰節制誰，便大有研究了。我們如果祇求急促工業化，而不論民生主義之成敗則已，如果不顧馬虎隨便，那負責戰後鐵道建設責任的人們，更妥念茲在茲，做民生主義的忠實戰士。

二 限期修復各路及建築第一期各路

戰後五年的恢復期，負有兩種責任，（一）為本國建設所必需的交通網，（二）為此後交通網繼續擴展的基礎。因此除舊路必須修復外，新線的選定，應加以詳密的規劃。要使中國成為大陸的強國，在這期內，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每個地方，至少應有一幹線，通到他們的經濟中心地點。這在傳統之中，到拉薩的要經過許多橫斷山脈，工程最為艱鉅。蒙古新疆地勢比較平坦，但經過沙漠戈壁，在工程上，亦有特別困難問題，而且沿線人烟稀少，物資匱乏，均不可能由戰時以兵工建築路基。軍事障礙，為戰後重要問題，於水利墾荒工程之外，更有這二途程，共成為所納軍隊復員的三大途徑。建築鐵路工程人士應及早研究的。蒙古新疆各線行車給水給煤，亦必有特別困難問題，蘇聯沙漠用的機車，使蘇汽冷却還原。又是機械工程人士應及早注意的。這幾條路線，應以控制政治中心為第一目的，對於開發資源之配合，不必過於考究，要緊的是工程要減省，行車要妥當。至於其他各省新線的選定，必須以開闢資源發展農工礦為第一目的。一方面地質調查的工作，應及早加倍推進。一方面動力中心，工業分佈等等計劃，應及早準備，凡此種種，都是現在馬上應開始研究的。

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是人口更多，平均每人耕地不過三畝，實在是太擁擠局促了。

來南洋成爲東亞的巴爾幹。爲和平正義而浴血苦戰的中華民族，要求於二十年後，國內平均每人耕地二十畝，我想這樣的要索，係各盟國所樂於贊助的。

因爲人口問題，把話說長了。現在回到如何拿交通的手段，來發展內地各省的農工礦產，來實現國防經濟。

華北各省的鐵路，有了二三十年的歷史，沿線各地帶的農村，逐步從糧食自給的經濟，各因土宜向商品作物化的途徑前進。河北晉南陝洛關中成爲棉產地帶，淮河流域及豫南成爲豆麥及芝麻地帶，魯南及豫東成爲花生地帶，其商品作物化之促進，則因有平綏北寧兩線，將關外口外糧食大量內運，以備克內地農村糧食之缺乏。從（一）穀物（二）棉類（三）油類（四）油餅肥料四大項作物而論，關外（一）（三）（四）項皆有剩餘，口外（一）項有剩餘，華北（二）（三）（四）項有剩餘，華中包括湘贛（一）項有剩餘，粵省四項皆缺，而有絲棉水菓的剩餘，西南各省除缺乏棉類外，留滯於比較自給狀態，這爲全國情形的大概。此後交通網繼續增加，各地農村生產將益向商品作物化的途徑邁進，這樣的趨勢，與自給的國防經濟背道而馳，表面上似乎應指遏止，其實大大不然。第一、農作物可以隔年改種，從經濟利用回到自給生產，並非難事。第二、我們的農村實在太窮苦了，若再遏止其向經濟比較豐裕的商品作物途徑上前進，對於整個國民所得，整個資本積蓄，打擊太大，萬萬不宜採取的。我們對於作物人口，（安南暹羅仰光之米，孟加拉之麥）應該採取什一或二十之一的

實物征稅的方法，來達成積穀政策。向來缺米以粵省為最，其實湘積餘穀，足以完全濟粵，祇要粵漢車運暢通，再加蒸曲江至贛州一線，便可解決粵省缺米問題。至於小麥之輸入，完全因為上海粉廠銷洋銷粵銷長江有水運之便，所以全國麵粉產量一半在上海，而洋麥市場及上海物品市場，有委做之便，所以才有巨量的洋麥入口，并非真正缺麥。如由海關征收穀物實物，再輔之以繼續兩年的田賦征實，將積穀分存相當地點，即使有戰爭發生，馬上就可以管制農作生產，確定改種糧食的面積，使合戰時需要，祇要積穀數額足以維持一年半的補充，便可以渡過難關了，而且農業專家，每稱改良種子滅除蟲害增加肥料的三大途徑，可以將全部農產增加百分之二十左右，這偉大的使命，新神農的福音，實現之後，再加以修水利墾荒地的增產，我們更可大胆向商品作物化的途徑邁進了。

計劃鐵道交通，和農業生產的配合，是要先有農產計劃來做根本的。因為缺乏交通，而有（一）未闢的土地（如河套），（二）被焚的穀物（如湘西僻縣之遇豐年），（三）未盡地利的作物（如比較留滯自足農產的各區域），這只是籠統的話，我們要將具體的農產計劃及早研究。

計劃路線最重要的配合，是與工廠生產的配合。各種礦產的分佈，與其開發計劃，水力發電的動力網（動力中心），和其邊沿工業的計劃，要先行決定的。區域經濟是反經濟的，不經濟的，其實施是增加負擔，減少成果的，所以我決不敢侈談區域經濟。但我要求兵工製造

及其原料工業（即兵工生產之全程），戰後仍然放在川康湘滇黔五省之內，這區域內鉄銅錫鉛乃至錳錫錒汞等都具備，對於兵工和其所需的原料，還要計劃整個的配合，使其在這五省之內發展。例如處寧水城西康等地鐵礦的儲量和品質均好，現在萬山中不能開發，將來或因運線太長，不甚經濟，這非不要緊，我們一方面用鐵路運價，一方面將全國鋼鐵業的盈虧互相撥補，其運銷區域，加以大體的（斷不是嚴格的分區分岸）規劃，便有辦法了。第二個國防工業區似可以甘陝晉綏為對象，但必須北以熱河東以殺西為屏蔽，還要於張家口并徑等地，建築我們的凡爾登。這區的鋼鐵以供給兵工和工業化的材料為目的，兩者應該相提並重，再輔之以東北現成的鋼鐵工業，為經濟性重於國防性的供給，在初期已經很夠用了。（戰後人士，個個思歸，技術人員，又多屬蘇浙粵省等籍貫，此後在兩個國防區的工作人員，其待遇宜優於在其他各地同等工作之人員）。

從前以海口商埠為經濟中心（尤其是工業中心）的時形，應該打破，是毫無意義的。數十年來便利租界工業發展的政治原因，已不存在，可不再論。上海工業所具有的優越條件，天然的存在水運，人為的有巨量的船舶噸位（碼頭堆棧等附）和巨量的廉價動力。再加以金融市場，商業機構等等的便利，於是紡織品麵粉以及一般用品的製造，皆集中於此，上海遂成為輕工業的中心。這種依着市場經濟的自然推遷，在國防經濟上則為時形發展。所以打破海口商埠的時形狀態，實為調整輕工業的分佈之別名，而非將其商業地位，加以剝削。輕工

業的分佈，應如何調配呢？以人口密度和購買力高度而論，自以江浙平原、珠江下游、直魯平原等地為最。將來輕工業的分佈，自然仍以接近人口重心地帶為比較經濟，同時接近原料，為經濟條件之一。故棉紡織工業，可以相當的移至棉產地帶，而麵粉工業的重心，因為原料及粉市的關係，可以移到直魯平原。武漢為全國水陸通衢的中心，將來輕工業的重心建設在此，更為合理。（缺點在煤運路線太長）。供給珠江下游初期的輕工業，似可與浙滬水力電網相配合。至於兩國防工業區內各種輕工業，必使其接近自足的境界。（兩國防工業區的糧食，本來是自給自足的，棉產則第二區有剩餘，該區紡織工業，應使其在平時可以接濟區外市場，戰時兩區合計，可以完全供給軍民需要，天成鐵路則為貫通兩區的通道）。

但是戰後五年的建設，專從鐵道和重工業的設備而論，已經成為極重大的資本負擔。所以輕工業的分佈，戰時不必過於嚴格，對於津滬各地已成之局不必過事更張，因為不必妥的資本負擔，是為該避免的。而且將來經濟發展，民生充裕之後，五百萬的紗錠，是絕對不夠的。這期對輕工業的政策，只在積極的助長武漢的發展，消極的限制滬津青廣的發展，而其着手之方，端在（一）佈置動力中心，（二）加築必需路線，（三）武漢輕工業成品的鐵路運價，盡量減輕，使與上海輕工業成品的水路運價相等。（例如棉紗從武漢銷廣州，必須能與滬紗競爭）。

我們對於農業生產（包括水利墾荒）、輕重工業、動力中心、國防工業區域種種計劃，

必須預先設計，這些計劃確定之後，才能計劃最合理的鐵道建設，所謂拿鐵道來發展實業，拿交通來發動生產，是再顯明不過的。此中還有一極重要的相互關係，初期鋼鐵事業，必需靠鋼軌的銷路，來培養他，所以將來實業借款，除修復舊路的緊急材料，可購自外國之外，其餘鋼軌鋼料（橋樑等），應儘量由國產供給。

三 更改鐵路管理組織及整理鐵路內外債務

發達國家資本，為實現民生主義極重要的手段，國有國營事業，為國家資本所寄托，這些事務必妥辦得極好，國家資本方能發達，所以國有國營事業要怎樣才辦得好，成為實現民生主義極實際極迫切的問題。

十餘年來，我國鐵路界的人士，外債的代表人，和與外債有直接間接關係的外國顧問，對於鐵路管理的改組，各有主張，各有獻議，總覺得管理組織有更改之必要。所提的改組辦法，均屬冠冕堂皇，從表面看來，如提高管理效率，鞏固財務基礎，發展客貨業務，均屬無可非議的。所提的方案，債有大同小異，而對於改用公司制度，以及業務商業化的兩種呼聲，各方一致，又似乎是不謀而合的。債權代表人有他們本身利害的特殊立場，客卿顧問儘管如何善意，究竟不脫居間人的地位，這些實情，我們不能不十分留意的。從前有位飽經世故的某君，以極為冷靜的口吻，說過一句話，「無私心不發公論」，這話雖然未免太過，但是

這樣的舉動，且應引起我們注意的。

假如鐵道事業，只以營利為目的，而不必問其所負建國使命之如何，假如借款築路，鋪軌鋼材以及等等設備，一味從外採購，不論其對於本國重工業影響之如何，假如所選的路線，以開闢中國市場，增加國際貿易為主旨，一味從推銷一般消費品，和吸收一般農礦原料上著想，而不必論其對於促進本國工業化之功用如何，那麼，債權人和債務人之利害，可以完全一致的。

債權人所要選的路線是以現成的業務之充裕為第一，（以前佔領勢力範圍之企圖，現可不論），而我們所選之線，則以具有建國的最大功用為第一。債權人對於釐定鐵路運費之企圖，以充裕收益，增進國際貿易為第一，而我們的政策必須以協助各種經濟建設具體方案之實現為第一。債權人希望以鐵路收益為外債還本息的抵押，而我們主張對於外債的義務，由整個國庫負擔，不以路收作押。鐵路無必須賺錢的責任，然後能充分發揮其運價政策的功用，然後工業化之促進，國防經濟區域經濟之建立，可以充分利用鐵道運價使其實現。這種種根本不同的立場，凡研究鐵道管理組織的人士，應該特別注意的。

鐵路管理局長可以隨便更換，實心任事的人士，未必能久於其事，管理局辦事太過官僚化，手續緩慢，失時誤事，商人託運，等於見官上衙門，凡此種種，為世詬病，所以一致主張商業化，而其具體辦法，則為改設鐵路公司。舊路改設公司雖未見諸實行，但近年來新路

之建築，籌借外債，因需要擔保或因其他種種關係，國內財團出頭參加，乘著商業化的呼聲，翻新花樣，設立公司，於是而浙贛、成渝、敘昆、湘桂各線，在大同小異的範疇之內，成立了官商合股的公司，公司設理事會，官商股分別派選理事。理事會有選線籌款，借入外債，決定營業方針，任免總理協理，核定預決算，支配盈餘，甚至經營沿線礦區等大權。從純粹的國有國營鐵路，一轉而為官商合辦鐵路，在制度上乃一極大的變遷。外債債權人雖不直接參與路政，但其間接影響，不能僅從借款合同之文字上來估計的。

我個人不敢苟同「商業化」的口號。粗淺的說，我希望國有國營事業，要辦得好，辦得認真實在。進一步的說，我希望鐵道事業工具化，使命化，革命化。鐵道業務的主持人，要拿鐵道來做經濟建設的工具，要肩起鐵道所負的建國使命，要有實現民生主義的革命決心。

其在以往，海關郵政鹽務三種公務制度，有比較安定的規模，比較規矩的風氣。即在軍閥割據極端混亂的時代，仍然安分守己，維持差強人意的局面，彷彿在防疫圍地內生長着，自成格局，自成風氣。滬寧鐵路杭甬路在英國總工程師大權時代，亦在同樣安定的狀態下維持着，但內容却腐敗多了（例如路煤扣例等等）。主張鐵路改設公司的人們，腦海中多多少少總有海關郵政的影子。我敢說這樣看法，是一種錯覺。第一、外力的保障，徒然把殖民地政治的風氣，移到我們的社會之內（職員對大眾的心理）。我們不但不願意他存在，而且此後亦無法存在，沒有本社會以外的獨立外力，使不能發生防疫的作用。第二、海關郵政是呆呆

位既的事務，而鐵路沿線有大法礦，有大煤礦的大老開，各車站有如地老程的轉運公司，職員三節，尚且受投開行之禮物，何況這樣複雜的鐵路環境呢？政治情形和社會環境，係整個的，如人在大氣之中，魚在大海之內，無法逃避的，壞的時候，所關「四海皆秋氣，一室難為春」，好的時候，野人免置，亦賦窮處。如何轉移風氣，如何保證國有國營事業辦得好，尚曾於「建立中心力量來保證民生主義的實現」一文中，詳述個人意見。抗戰後國家安定，一切經濟必有空前的發展，在這個時候，假如一國才智之士，不願効力於國有國營事業，而向私人做生意興實業的途徑上發展，在其主持國有國營事業的時候，不能做民生主義的忠實戰士，反而利用地位，結交私資本的鉅子，來自己走仕而優則商商而優則仕的好運，如此，則民生主義無法實現了。鐵路業務，此後的頗感，不怕他不近代化，而最怕他走上結交私資本，向商業惡化的途徑上去。本來鐵路沿線，有不少的大煤礦，他的誘惑力已趨均大，又加以改設公司之後，官商合股，財團取得法定的地位，來支配國有國營事業，其形勢愈加嚴重了。

將來鐵路內外債，必須整理，預料在這個時候，更改鐵路管理組織的提案，必然連帶發生，甚且塵上。假如外國債權代表有提議，將所有債務，化零為整，並且加借新款，修復舊路，展築新路的。而附帶提議，將全國鐵路，不分新舊已築未築各線，統歸一個公司辦理，並設類似理事會之組織，俾債權代表人得參加其事，復以將來全國鐵路收入為統一內外債還本

付息的抵押，在債權人方面，因其特殊立場的關係，這樣建議，可謂專自為謀，故其發生，是很可能的。我們的答覆是，統一外債，化零為整，以新債換舊債，是我們可以接受的。但須由整個國庫負擔，不能以鐵路為抵押對象。因此組織全國鐵路公司，設理事會，使債權人參加一事，根本可以不談。

發行統一新債，掉換舊債，便可將以前個別路線借款合同，次第取消。照我個人的理想，是要將線局改為區局，因此取消個別路線借款合同，是遲早都要辦理的。

為統籌全國鐵路財政，計算整個盈虧起見。為施行整個鐵路交通政策，總攬全國鐵路業務起見，當然要有一個主持全國鐵路的機構，或設全國鐵路總裁，或恢復鐵道部，均無不可。因為他是執行全國經濟政策一重要部門的機構，他的主管長官，必須為最高經濟會議的當然委員之一。

為實施國防工業區的計劃，為實現分區的经济計劃起見，此後路線逐漸增加，成為鐵道網，為便利集中管理起見，為分區計算盈虧起見，以後鐵道的管理組織，改為分區制，實最合理。其在已往，因為個別路線借款的關係，不容分割，不能調整。此後的改革，當然不能再定這種牽制。

四 釐定鐵路運價

以前鐵路運價，只有（一）貨分六等，（二）根據成本，（三）噸公里單價遞進遞減，

(四) 可在範圍內，其文字有三，一五 糧食專價，一六 國貨定價或字，各種辦法。其計算基準，概為每噸公里單價。除第六項外，其出發點既為鐵路業務財務之本身，而非以發展經濟，調節經濟為目的。其改良運動，又只集中於推行負責運輸，亦係從業務上着眼。其不良現狀，則有兩路爭運的賤價（如津浦瀝海之爭）。在中樞方面，既未確定通用鐵路運費，來發展各種經濟之遠大政策。在部方，對各路經濟區屬（*Belgium, Holland*）以及各區內經濟狀況，又極端囿固，且不注意。即在路方，所焦點亦慮者，純為應付現狀，對於鐵路之經濟使命，亦復漠不關心。一般社會，對於關稅和工資保息等等，都已注意，知道是調節經濟，發展工業的利器。惟對於同樣的利器，——鐵路運費——反少過問。對運費功用的漠視，實為最大缺點，此後應即切實糾正，這是毫無疑義的。

鐵道網及運費，亦與煤礦的生產計劃相配合，上面已經說過很多。至於第四項的基本政策，是以運售政策來指導而民生物資的價格，使各地趨於一致。這句話的內容和用意是怎樣呢？內地邊省的人民生活水平知識程度，均不如沿海沿江各地的人民，因為農產品的出口市場，消費品的入口和製造，均在滬津各地，距離港口越遠的，運費成本越大。因此中東和海州的花生，同時在上海競標的結果，必然是海州的市價高於中東的市價。包頭和張家口運入高粱粟米，又因運費關係，包頭的價錢，必定高於張家口的價錢。所以不論輸出入，即海口越遠的人民，定是吃虧。他們的實際所得，總是越遠越少。我們要各地的農工

拿同樣的生產，添一兩倍的享受，我們要充實內地邊省，勿使留滯於落後的苦境，這樣的目的是，是應該運用鐵道運價使其實現的。我們為維持鹽序，防止侵銷起見，却會把服岸鹽價提高起來，彌補邊岸平價的短收。至於拿鐵道運價，來平均各地人民的所得，反沒人注意。只會打既史的算盤，不打經濟政策的算盤，未免可惜了。

我們此後，要十分注重鐵道運價，要使他補助各種具體經濟計劃的實現。不但要澈底打破歷來路收政策的觀點，而且要設立運價委員會，有經濟部農林部的代表，充任委員。各鐵路管理區業務所轄的業務，由部統籌檢核，如全路統籌，仍有所損之時，由國庫撥補。如此則主持管理的人不必急急於路收的增加。從前的運價，大都由路方擬定呈部核准，但其實權，則在路方，各各著眼於路收的增加，這樣情形，應該根本改革的。

從以上所論，我們應該明白鐵路只是經濟的工具。如要這個工具發揮最大的效能，一定不可考慮他會多與做主要的目標。基於同樣理由，更衝然反對以個別路線收入做借款抵押，即使他對不該主張，但其趨勢，仍必使各路分取路收政策，而妨礙運價的經濟功用。

五 國際經濟

貿易投資及匯兌——建立新的國際經濟關係

係

一 戰後世界的前途 中國的責任 國際經濟的新路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我們在兩千四五百年後，彷彿還聽得見孔子參與禘祭喟然興歎的遺音或覺到他老人家夢想大同至天個人的情懷。誠然的「……貨力為己……故蘇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自從蒸汽機發明，到現在還沒有兩百年，而貨力為己的私圖，更加有所憑藉，遂如猛虎添了毒大之氣。再加上了滿身野蠻血腥夜郎自大的太極魂，以及冒充科學而實為祭司行咒的什頓狂，一希特拉的「Hitler」以北歐條頓種為世界最優秀民族，有生有存特權，其餘都是次種劣種，應該淘汰，「E. O. R.」有譯為大北歐主義者，不足表明其妄謬，應竟譯為「條頓狂」耳。三十年中世界遂發生了兩次大戰。

由於人類好生之性，是非之心，循着征服自然增進生產的軌線，漸漸離開實運處此，扼腕相持的數道，而進於和平正誼的人道。自從科學昌明，兩百年來，生產的邁進，開前史未

有的速度。而階人類於前史未有的經濟鬥爭亦復踵踵而至。然而我們祇要把握光放長些來看，便知道這些鬥爭，祇是人道進化洪流中的急流迴瀾，而「常則變，變則道」終為大同道上必然的進序。

當大戰方酣之際，誰也不能肯定戰後的將來是怎樣的。但我們至少感覺得：「通未必大通，而變則必大變。」希特拉余佩的社會主義（所謂純粹的國家社會主義）來麻醉德國青年，天天罵民主國家為國際猶太和富彙政治。日本軍閥利用擁護天皇的神道迷信，裝上裁抑資本的王道外殼，造成他們的「新體制」來欺騙羣衆。戰後的德日採取甚麼政體，發生怎樣的經濟變化，此時誰也不能預料。我們知道最不容易改變的是民族特性，最容易恢復力量的是勞動羣衆並且富有技術與組織的工業國家，最缺乏客觀標準是國際公道。在國際公道方面「共榮圈」而居於天下之盟，正如法越的勾踐，不難解除其武裝，而最難消弭其仇毒。戰後國際經濟的凋殘，在辦法上必須十分澈底，在精神上必須一視同仁。然而為了防範着仇毒未消而力量先復，在步驟上，恐怕又必須分期實施。這樣理想的艱鉅的國際合作，能否實現，能否順利繼續推進，而不致反節檢生，此時誰也不能預料。我們自然要消弭對方的仇毒，也而道「未有不正己而正人」，但我們亦問問在客觀的經濟條件上，需要怎樣的調整本身，方能正己。我們也而道合從連橫是古之六分勢均也等等國際交際，是與和平正道背道而馳。

但我們要問問在客觀的經濟條件上，需要怎樣調整自身，怎樣進行合作，才不必再行採用這些舊時代的國際政略。春間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在阿洲演說，很偉大的指出戰後的危機。他說：「（一）那教精神的民主國家和唯物史觀的蘇聯必須求得互信的合作，（二）英帝國必須改變其舊日作派，否則第三次世界大戰勢終不免。」我們相信諍友才是真友，諱疾決非良醫，華萊士的演說是很可佩服的。我們更相信在大同道上是一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我們一定要從異中見同，異中求同，而決不可因異立異。否則經濟制度這樣不同的各國，經濟事業這樣複雜的世界，如何可以合作呢？我們要十分真誠的向和平與正誼的方向去努力，「樂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一勿決不可「月據一據，以待來年。」

佔世界全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是有力量可以分肩世界正誼和平的責任的。在兩千五百年前已經發明了兼澈底的非攻主義的中國，（墨子；今至大不義，攻國，則弗之非，從而舉之為義。）而且實際上早已脫離了侵略的國族主義而進於王道的中國，在客觀上不但可以自信而且可以使得世界相信我們一定能夠很忠實的分肩這個大責任的。我們領袖在他的「中國之命運」說行最透澈。他說：

「積五千年的治亂興亡，以成就我民族明廉知恥，忍辱負重的德性。惟其明廉，故能循分。惟其知恥，故能自強。循分故不陵侮異族。自強故不受異族的賤侮。惟其忍辱，故民族的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著的。惟其負責，故民族的志氣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

由此種德性的推演，故中華民族的各宗派及其國民皆能為大羣犧牲小體，為他人犧牲自我，而養成其自衛則堅忍，處世則和平，更進而以「存亡繼絕，濟弱扶傾」的仁愛之心，行「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忠恕之道。」

在戰後建立新的國際經濟關係的空前大業中，我們中國所能貢獻的是什麼？我們所希望的援助是什麼？其在已經，各國低看也中國有四萬萬的人口，祇要開發交通，改良生計，便是個極大的主顧。直至一九二二年的九國公約，還是拿機會均等，門戶開放的方略，來開發中國市場。我們現在要向全世界極強烈的申說：富強康樂的中國所能貢獻於世界的，決不僅是四萬萬的頭主，而是分肩世界和平正體最忠實的會員。我們最大的貢獻，決不是片面的商務，而是全面的正誼與和平的維持。我們所希望的是援助我們的工業化。我們能夠維持正誼與和平的力量，跟着我們工業化的進展而增加，隨着工業化的完成而永固。

即在國際經濟的本身，中國的貢獻，決不僅在四萬萬頭主的購買力，而正正因為資本缺乏生產落後的中國，恰恰能與蓄積過多而引起生產失調的先進國互相調劑，來減少經濟恐慌的痛苦，乃至預先消弭其發生。上次世界經濟恐慌，其程度的嚴重，國際的普遍，時間的延長，已經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缺點。這個制度在久已達到高度生產的社會，其所發生的生產失調，勞動失業，已非為利潤而生產的商業行為所能自動挽回，而必有待於政府的措施，超商業的行為，為之補救。及至恐慌勉強度過，而失業餘波，竟成了長期不退

的現象。關於經濟危機的學說，不論如何紛歧，但高產生產的社會犯了為之過疾，用之過苛，消費跟不上生產的怪病，已為大家所公認。一個經濟社會的動作，合起來計算，則總生產等於總所得，而今日的總所得又為明日的總購買力所自出。分開來檢討，則每個人的所得（即收入）愈多，其不用於消費而積為儲蓄的部份所佔原收入的比例愈大。因此而已經生產的消費品發生了產存積聚多或少之市場現狀而遂步跌價。因此而生產積項貨品的企業發生了不景的危險，更因此而該部門的新企業新投資便要減少乃至停頓。一面所積存的資金——不用的購買力——日多，而另一面所能吸用資金的新企業日少，便發生了供過於求，蓄積多於投資的時形。物價一經發動了下跌的趨勢，生產隨而減縮，因其產量之減縮，則供給原料之企業，隨而衰退，因其前階之縮減，而供給發生產設備之生產，隨而不景，由甲業牽累乙業，乙業影響丙業，層層而蔓延至全島。生產既減，失業既增，因此而對產品的購買力，普遍的衰落，物價之因而而總然下跌。由此而銀錢成圓，樹稼成米。價跌的處乎隨着國際貿易的停滯，伸到他的國方於是大家爭相閉關自守，因此而去路愈少，生產愈縮。社會中所發生的時形是：皆有餘而購力缺，有餘而無法投資，有餘力而無從就業。這樣的汪洋，愈陷愈深，而其行為的本身，也無能力足以自救。所以國家要發動財政手段，來救濟失業，發動公共建築，來放利物價，發動生產限制，來挽回市面。如果英美的缺點，在於為之過疾，用之過苛，而利息又為低，則金銀的市場，成為餘資就業的障礙，如來

商業行為不能自投於經濟恐慌的泥淖，而必須超商業行為的政府行動，能以援助之。那末戰時之租借法案，恰好可以成爲戰後經濟合作的現成藍本。將來如不仍須加蓋許多不必要的公路，由來救濟失業，救利物價，何如將大量機器和物資由政府以超商業行為的資本輸出借與生產落後生活困苦之國家，同樣的，以宣洩國內存貨救動國內生產，從立己立人這已達人的大道來，促進全世界的大同，提高全人類的幸福呢？

從前世界之所以爲帝國主義的世界，因爲生產先進的國家，拿政府的力量，來做國民商業行為的後盾。此後的世界，如果以成爲望見大同的世界，必因生產先進的國家，拿政府的措施，來補助國民商業行為的缺陷。假如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健全競爭說，辛那的 *Sinn* 的克己積資利息酬儉說，爲資本主義初長期的寫真，馬克斯的榨取餘值吸血自肥說，爲資本主義壯盛期的寫真，凱恩斯的過量儲蓄說，爲資本主義成熟期的寫真，我們又不得不唱然與歌，有見於經濟恐慌之繁時，非經濟歷史本發生以前所能想見。依初長期斯年兩氏之說，祇要利己即可利人。依壯盛期馬氏之說，既然利己，必至害人。我們如果引伸成熟期凱氏之說，以觀商業行為的資本輸出，來宣洩過量餘備，我們便可以說：必須利人，方能利己。第一次大戰後所得的經濟教訓是：因爲國際收支不是單向的交換，所以由賠款付出的支數，必須有貨物出口，將其收回，結果收受賠款的國家，其生產事業反受外幣湧入的打擊。所以這個教訓是：個人終至損己。上次空前的經濟恐慌，既已成熱期的過量餘備造成其主因，那末此次

戰後應有的覺悟是：應該從起商業行為的國際經濟合作（尤其資本輸出）來避免從前的懸懸。這樣的覺悟是：利人方能利己。這真是所謂「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如果經濟發展所已經到達的客觀境界，是要人們以義方可為利的，那末大同的曙光，豈不燭的可見嗎？

國際經濟的三大關係是：（一）貿易，（二）投資，（三）匯兌。我們現在暫時離開大同的理想，回到身之無高的現實，將這些問題，逐一討論。

二 從工業化的中心需要來討論國際貿易、投資和匯兌

高程度的工業化，並於工業化的過程中建立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這是我們的基本需要。因此我們對於（一）國際貿易，（二）國際投資，（三）國際匯兌所應採的政策，當然以實現我們的基本需要為依歸。在另一方面，我們對於改進世界經濟，分肩有重大的責任。大西洋憲章對於改進世界經濟的兩大原則是：

4th. They will endeavor with due respect for their existing obligations to further the enjoyment by all states, great or small, victor or vanquished, of access on equal terms to trade and to raw materials.

5th. They desire to bring about the fullest collaboration between all nations in the economic advance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自從二十六國同盟宣言擁護憲章之後，我們對於這些原則，有共同推動其實現的責任。又自從各樣貨品租借之盟約和美國簽訂租借協定之後，所有簽字國將采有以協定的行動，並邀請同盟國家參加協定，共謀發展國際貿易，改進世界經濟的衰弱。將來該項協定其範圍包括適當的國內及國際的措施，以達成生產，就業，交易及消費之擴張。在國際貿易方面，包括關稅及其他貿易障礙之減低，包括一切差別待遇之廢止。

向來和我們有密切經濟關係的國家（戰後當然包括日德義，經濟關係隨邦交而恢復），他們的立場和需要，全國和困難，各各不同，成為極端複雜的現實。一切方案，求其切實可行，必須注重現實。我們對於國際經濟三大關係——貿易，投資，匯兌——於兼顧各對方國極端複雜的現實之中，要怎樣規劃我們的方案，才能合乎我們民生主義工業化的總指針，才能夠分肩起改進世界經濟的大責任。而且貿易投資匯兌三大問題，皆息息相關，互為影響，尤須要有全貌的觀察，綜合的規劃。在這樣多方的複雜之中，不但理想與現實，可以有不少的衝突，即理想與理想，亦可以有多少的矛盾。這些衝突和矛盾，其真實性如何，必須加以分析，其嚴重性如何，必須加以度量，其調和的可能性如何，必須加以探討。例如盟邦主張自由貿易，而我們工業化的推進是否必須有關稅的保護。如穩定世界經濟必須廢除匯兌貶值的競爭，而放棄匯率自主權有些什麼重大流弊？如東亞的永久和平，必須求得中日的相安與共榮之道，而兩國間的經濟，是否可以行到合理的調整？如中國的工業化必不大量借入外

子，所得來的這本什物，是否發生國際收支上重大的盈餘的現象，對於這樣盈餘應如何補救？我們要增加我們的償債能力，必須發展我們的出口貿易，而其內容數量及方向，是否與他國發生尖銳的衝突？所有這些問題，我們都要精密的加以考慮。

三 國際貿易

中國工業化是否應保進國稅？我們可以從已往的輸入，與及將來工業化的方向和其需要，作一探討。

個人於所著的「中國海關稅務主要商品流通概況」（交通大學研究所民廿六年出版），曾將民元至民廿五的主要進口商品二十五種詳加分析，並將其他進口商品作歸納的分類研究。現從該書作（甲）（乙）兩個表表附入次頁。

（一）棉紡織工業 從遠東而及于，我們很顯然的看見日本係我們棉紡織工業的勁敵。他不但對中國，而且向暹羅南洋菲律賓印度各地的棉紡織品輸出早已奪了英帝國之席。他不但如此，而且有二百數十萬的紗錠在，因，其動能之高，成本之低早已壓倒華商紗廠。在各種工業成品中如果需保護國稅的，當然以棉紡織品為最重之。中國棉紡織業自從第一次歐戰

乙表 其他入口工業品之分析

單位：百萬關兩

類 別		1918	1921	1927	1935	備考
雜 工 業	飲料	7.57	9.87	12.32	5.26	
	錫用品、錫精類	7.41	9.05	15.46	5.08	
	，，皮製類	3.50	2.08	1.67	.74	
	，，混合類	7.80	11.92	9.15	2.32	
	，，附屬類	3.76	3.10	3.82	1.11	
	一般日用品	25.30	28.33	31.05	7.66	
	農作具	0.77	0.93	0.98	0.46	
	玩具	2.17	4.03	4.91	5.09	
	文化用具	1.91	4.50	4.86	7.19	
	以上共計	60.21	73.61	84.22	31.91	
化 學 及 原 料 工 業	調味品	2.25	2.56	2.28	2.34	
	顏料	1.98	10.47	8.32	12.38	
	藥品	10.70	10.47	14.84	10.82	
	火柴工業原料	2.94	6.04	6.65	7.65	
	化學品工業原料	0.46	0.63	0.92	4.42	
	皂燭	1.86	1.99	6.95	6.56	
	紡織	0.37	0.72	2.15	4.96	
	其他	16.37	18.04	15.99	13.19	
	油漆	1.59	3.46	2.53	3.29	
	肥料	0.75	1.19	1.82	1.28	
普通工業用料	5.58	7.98	12.15	10.12		
以上共計	44.85	62.57	74.60	77.01		
機 器 工 業 及 建 築	五金	9.29	21.61	16.09	9.22	
	機器及配件	13.23	50.15	30.52	37.92	
	交通工具	7.55	35.46	23.17	31.95	
	建築材料	4.16	11.60	9.60	7.03	
以上共計	34.23	118.82	79.38	86.12		
合 計		128.59	244.43	223.36	187.22	

總 建 五 餘

甲表 25種主要入口商品之分析

品別	數 量		1912-1935主要進口國佔前項數量之平均%							佔進口總值%				數量單位		
	1918	最高年份	1935	日本	英	美	香港	其 他	1918	數量最高年份 值 %	1935					
紡織工業	棉紗	1,211.0 民3	2,724.0	19.0	47.7	19.3	印	28.2		9.6%	70.0	12.3%	0.2	千關擔		
	棉布	98.0 民15	171.0	13.7	53.5	12.5		8.5		16.9	167.6	14.9	2.3	百萬關兩		
	棉本色	43.9 民9	73.4	1.5	69.7	17.8								,,		
	棉漂染	44.7 民18	108.2	8.3	42.5	44.1		10.1						,,		
	印花	4.2 民17	29.7	2.4	68.7	16.2		5.0						,,		
其他工業	錫	4.2 民21	7.7	1.0	40.4	29.3		20.4						,,		
	呢絨	4.7 民17	38.2	6.2		58.7		10.9		0.8	37.6	3.2	1.0	千關擔		
	絨線	3.7 民18	98.6	14.2		51.4			24.9	德	0.1	16.0	1.3	0.3	千關擔	
	麻袋布袋	5.0 民20	18.8	2.5	30.6	26.9	印	31.6		0.9	18.6	1.3	0.4	百萬關兩		
其他輕業	麵粉	0.1 民18	11.9	0.8	23.2		38.7	21.1	11.9	次拿大		62.9	5.0	0.7	百萬關兩	
	糖	8.9 民18	14.9	4.9	23.9			44.6	22.9	荷 印	10.8	98.6	7.8	3.0	,,	
	紙	7.4 民20	45.5	25.1	32.8			10.6	9.6	俄國 8.8 瑞典	1.3	45.4	3.2	4.2	百萬關兩	
	紙烟	9.3 民12	10.2	0.2		23.0	53.5		8.1	次拿大	4.3	28.3	3.1	0.2	十萬萬枝	
化學業	人造絲	無 民18	150	6.4	13.1				51.8	德	12.2		16.3	1.3	0.8	千關擔
	靛	64 民18	426	143			20.0	12.9	28.5	德	0.1	17.2	1.4	1.5	千關擔	
	硫酸	無 民19	3,197	1,135		22.5		43.1	23.7	德		18.5	1.4	0.6	千關擔	
燃料工業	柴油	35 民23	403	392			40.3		36.8	荷 印	0.1	13.7	2.1	2.1	千噸	
	汽油	1.2 民24	41.0	41.0			41.7		38.8	荷 印	0.1	12.7	2.1	2.1	百萬美加侖	
	煤油	113 民17	263	102			65.0	12.4	11.2	荷 印	5.1	62.4	5.2	4.1	百萬美加侖	
及業	煤	1,114 民15	2,993	762	62.4			11.2	15.4	安南	2.3	26.9	2.4	0.9	千噸	
	鋼鐵	15 民18	64	62	14.2	18.2	16.5		20.1	比國	4.9	52.8	4.4	8.1	萬噸	
機器業	紡織機器	1.7 民11	30.5	9.3	28.3	47.8	12.9				0.3	30.5	3.2	1.5	百萬關兩	
	電氣機器	無 民24	5.3	5.3	9.7	28.5	16.0		24.0	德		3.8	0.6	0.6	,,	
農產	米穀	7.0 民21	22.5	21.4			49.7	20.6	安南 12.3 暹羅	4.1	119.9	11.4	10.2	百萬關兩		
	小麥	無 民20	22.8	8.6			20.1		51.2	澳 22.0 次		87.6	6.1	3.9	,,	
	棉花	192 民20	4,688	907	15.0	45.4	印	36.4			1.1	179.1	12.5	4.5	,,	
林產	茶葉	187 民20	1,257	137			83.2	7.5			1.0	48.5	3.4	0.9	千關擔	
	木材	6.0 民20	27.5	15.5	20.7		41.8		10.3	次 7.6 俄	1.1	27.5	1.9	2.6	百萬關兩	
海產	魚介海產	16.5 民13	29.6	12.0	34.6			40.5	7.6	澳洲	3.0	29.4	2.9	2.0	,,	

以來已有長足的進展。從民三至民廿四，棉花則從五十五萬擔之出超變為三十八萬擔之入超，（民元至民廿四平均入超每年七十三萬擔）。棉紗則從二百七十二萬擔之入超變為二十二萬擔之出超。本色粗布之輸入，則從民九最高峯之七十二萬九千餘萬開兩續行下跌至民二十之八百七十餘萬開兩。惟漂染棉布則繼續從民七之四千六百餘萬開兩升至民十八之一萬零五百九十餘萬開兩。印花棉布數量雖較小而增加半數；從民七之四百五十餘萬開兩升至民十八之二十六萬三千餘萬開兩。粗紗已是出超，本色布差能自給。（不要忘記日本在華紗廠，實非自給也。）我們對棉紡績的政策，應努力向高等成品化及大量出超化的兩方向做去。（努力出超理由詳後。）現將各紗布輸出入的情形摘要作簡表如次：

年分	棉花		棉紗		棉布		其他					
	入	出	入	出	入	出	入	出				
1914	2,912.7	- 9,870.0	0	+ 70.0	11.2	2.0	+ 11.0	184.9	14.7	+ 170.2		
1927	79.8	47.3	+ 32.5	17.7	19.8	- 2.1	128.5	16.1	+ 112.4	226.0	83.2	+ 142.8
1929	91.1	28.6	+ 61.5	14.3	18.3	- 4.6	164.6	15.6	+ 149.0	270.0	63.5	+ 206.5

取甚厚政策。輸華部份還不是最重要的。

(二) 其他輕工業 民十六輸入數字如次

紙	20.9
麵粉	4.5
糖	21.3
紙	74.9
紙	25.4
紙	12.8
「其他消費品」(見乙表)	114.2
	244.0
單位	1,000,000 圓兩
估該年進口	24%

中國森林缺乏，造林保林最關重要。紙的主體原料為木材，其主體用途為文化事業，故其入口顯然不應征關稅。戰後台灣歸還，糖的問題也自然解決。麵粉工業，早已自立，且大量購用洋麥，故麵粉不須保護。其餘各種輕工業品的現成市場，厥視之似為促進工業化的極好園地。一其他消費品——一項包括種類繁多，從洋酒到玩具，從手錶到雨傘，從球拍到口紅

，凡永安先施所陳列的應有盡有，「其他消費品」連同呢絨線紙煙三項大概都是「中上層」階級的消費品，卻係高等洋貨和「日貨」。主張節約建國的人們有認為對奢侈品應科以最重關稅乃至禁止其入口的。這話有點似是而非。奢侈品不論舶來或國產，皆應科以同樣從重的消費稅。如征最重關稅，不論消費稅的有無，一樣的確勵財力物力從事於奢侈品生產而已。這些高等洋貨的仿造其困難不在成本高於舶來原品，而在技術和經驗的不足，個人意見則重維持原稅率，但為維持匯兌率之穩定起見，遇必要時，施行入口定額制。

(三) 化學工業和液體燃料工業 石油工業的汽油煤油柴油，定氮工業的硫酸銨和使用定氮工業產品的人造絲（需用硫磺），以煤焦副產為原料的顏料和藥品，在國防上最關重要。這些商品在戰時的輸入量已為甚大。

1927

煤油	41.8
汽油	6.2
柴油	1.0
<hr/>	
	51.1
硫酸銨	5.2
靛	10.6
其他顏料	8.3
人造絲	11.2
藥品（一半）	7.4
	42.7

單位 1,000,000 圓兩

為建立國防的必需基礎起見，我們必須施以適當的保護關稅。但應再加考慮的是石油工

業，我們對有現存資源是否應該盡量開發或抵銷量開採來維持着相當的廠礦以備不虞，同時祇征較低的關稅，以減輕動力成本。煤油為取光燃料但製造上則為提煉汽油的副產，故如石油工業需要保護時，煤油亦應在稅保護之列。

(四) 鋼鐵及機器工業 機器為建設工具，一般意見有認為不應征稅的。但是我們如果作進一步的分析，便知道機器保護稅，在使用機器的工業其負擔有限，在製造機器的工業其幫助甚大，而且機器工業的建立，和大量高等技工的養成，在國防和經濟建設上關係太大。所以個人意見側重征以適當的保護稅。鋼鐵工業的主要銷路為鐵路鋼軌鋼材，而尤以初期為最重要。我們要重新建設鋼鐵工業，此後鐵路必須購用自產的鋼軌鋼材。(戰後初期的修復當然例外) 鐵路和鋼鐵工業均屬國營，此後借款築路不得再購外洋鋼軌鋼材，這是起馬的配合，起馬的計劃經濟。確定了這樣的辦法，鋼鐵不須關稅保護。如米仍然締訂舊式的借款築路合同(以前英國和比國的合同)，即有關稅保護，也沒有用。

(五) 農產品 米較為工資重要因素，小麥棉花於棉皆屬工資原料，絕對應採低稅政策。從前有些人看農產品入口數量之大，震動失色，以為中國以農立國而有鉅額的米稅將麥入口豈不是瀕於破產嗎？這種缺乏研究的觀察，是很可以遭成錯誤的輿論的。棉花的大量入口，因為紡織工業的發展，代替了棉紗的入口。小麥的大量進口，因為麵粉廠一半在上海，因為洋麥可做期貨，同時麵粉期貨而確定製造利潤。(詳見拙著「小麥與麵粉」) 米稅的

大量入口，因為國內交通不便利。我們出口的商品差不多都是農產，地狹人稠的中國農戶（地狹是從人與地的比例而言），自不斷的向最有利的商品作物來利用土地，而絕不為要求一切農產的自給自足。不惟不妥，並且不可能。我們的經濟趨進步，輸入的農產品數量越大，這不是可怕而是可喜的事。我們須增加生產總值，發展國際貿易，農作方面，必須各盡土宜，去種那利益最高的商品作物。從國防方面，也許有人主張糧產自給，這又是似是而非，密多利少的意見。從國防和儲蓄起見，我們要積極恢復積穀制度，其一部份的來源可從米穀入口帶進實物的關稅，漸次把儲蓄建立起來。（參閱拙文「戰後鐵道交通所負的建國使命」）

如何發展我們的出口——這是國際貿易的第二個大問題。所有國際借款的還本付息，最後是要拿貨物出口來償付的。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個農國，所以出口商品大抵來自農產。然而除却日就式微的絲綢屬於特產，東北大豆確有大量剩餘之外，我們農產出口的情形實在太可憐了。在豬身上拔幾根毛，在陸地種幾顆油桐，於是豬鬃和桐油成了主要出口商品。我們的豬鬃特別好，因為豬種特別壞，我們不講究選種，沒有將野豬血統選掉，才有很粗的豬鬃呢？更慘的現狀是營養十分不夠的農民每年拿他十分需要而捨不得吃的蛋白質和油質運到外洋。我們且有下例的數字，真可以潸然淚下。

個人於所著的「中國海關鐵路主要商品流通概況」曾將歷年出口，從生產性質上加以分析，現將提要列表如次

品 類	1912-1935 每年平均 數 量	1912-1935 每年出口值 1,000,000 關兩	
		最 高	最 低
蛋白質類			
蛋白蛋黃	623,000 擔	42.6	2.0
蛋	565,000,000 個	17.3	1.7
		<u>59.9</u>	<u>3.7</u>
油類			
花生	658,000 擔	8.6	2
花生仁	1,259,000 ,,	19.5	4
花生油	529,000 ,,	13.9	2.7
芝 麻	1,327,000 ,,	15.6	1.1
豆 油	1,347,000 ,,	30.0	3.7
		<u>87.6</u>	<u>8.1</u>
蛋白質及油類共計		147.4	11.8

生 產 分 類	1918		1927		1932		1935		
	值	%	值	%	值	%	值	%	
畜 牧 及 狩 獵	A	20.29	4.18	36.30	3.95	16.44	3.34	20.90	5.66
	B	5.30	1.09	11.77	1.28	7.33	1.49	5.87	1.59
農 村 商 品 物	共	25.59	5.27	48.07	5.23	23.77	4.83	26.77	7.25
	A	75.64	15.57	191.14	20.81	117.55	23.85	62.57	16.94
農 村 副 產	B	16.10	3.31	59.89	6.52	27.49	5.58	13.13	3.56
	共	91.74	18.88	251.03	27.33	145.04	29.43	75.70	20.50
農 林 工 業	A	31.51	6.49	57.28	6.23	32.94	6.67	45.05	12.20
	B	55.11	11.35	85.94	9.35	55.68	11.29	55.71	15.08
礦 產	共	86.62	17.84	143.22	15.58	88.62	17.96	50.76	27.28
	A	184.90	38.06	324.44	35.32	147.72	29.97	78.36	21.22
礦 產	B	18.68	3.84	50.07	5.46	20.76	4.21	20.42	5.53
	共	203.58	41.90	374.51	40.77	168.48	34.18	98.78	26.75
礦 產	A	22.78	4.69	44.90	4.89	17.17	3.89	29.82	8.08
	B	32.19	6.63	10.23	1.11	7.68	1.56	2.54	0.69
共	54.97	11.32	55.13	6.00	26.75	5.45	32.36	8.77	

註 A: 主要商品部份 值: 單位百英鎊

B: 其餘部份 %: 佔該年出口總值

主要商品共二十九種如次

畜牧及狩獵 皮貨 綿羊毛

農部商品作物 茶葉 黃豆 棉花 花生 花生仁 芝麻 蘇

農部副產 蛋 桐油 生牛皮 豬鬃

製造工業 棉紗 棉布 絲 綢緞 麻製品 蛋白蛋黃 豆餅 豆油 花生油 熟牛皮

雜貨

礦產 煤 錫塊 錫 鐵礦砂 鎢礦砂

上列各種製造工業都是農產加工，所以我們的出口百分之九十實均來自農部的生產。我們的礦產資源，照現已調查的地質而論是很缺乏的，我們的農部是過着節衣縮食的生活才有出口的。礦產雖有錫鎢錫系的特產，而數量不大。農民生活稍為優裕之後，也不希望再有蛋白蛋黃的出口。以後我們的出口應該向那一方面發展呢？中國既然少的是資源，而多的是人力，此種惟有靠大量的人力出口，其次靠農產的增加。人力出口最有可能而又最主體的是勞力發展棉紡績業，使其高級技術化，及大量出口化。農部小工業及手工業的成品擇其合乎國外銷場的積極努力把他發展，是人力出口的第二條路。中國可耕而未耕之地不多，故在農產方面增加出口的希望在一）增加每畝產量和二）最有利的商品作物化兩條大路。

四 國際投資

加速經濟的發展，加速工業化的推進，祇有兩條大路：第（一）以計劃經濟來增加生產設備（即資本品）的生產，第（二）以借入外資來幫助國民蓄積的不足。這兩條路是可以並行不悖的。現在中外的輿論都認為中國應該而且可以大量借入外資，來發動大規模的交通建設和工礦建設，所要討論的還是投資的方式和條件。我們應採取的方式和條件，不但要合乎我們的國策，還要合乎對方的需要，不但要能夠借入外資，還要能夠大量的借入外資。如果不合對方需要，祇是紙上談兵，如果不能大量借入，也負不起時代的使命。投資的方式不外三種：

（一）兩國政府間直接借貸

（二）經發行銀團的仲介有證券市場發行債券

（三）直接投資經營生產（工礦）事業

第一個方式在實質上為超商業行為的國際經濟合作。羅斯福總統秉政以來，已經運用過「新政」的機得，對中國成立棉麥借款，桐油錫錫等易貨借款，實開這方式的先河。自從租借法案成立之後，國際上發生了新動向，美國既以對方共同實現他對戰後世界經濟的理想，為戰時軍品租借的報酬，為充分完成這理想的實現起見，這個戰時租借方式很可能的引伸為

戰後經濟和戰後建設的租借方式。如果該項經濟和建設確為實現新的世界經濟所必需的條件，在道理上，應有實現的可能。美國正高唱爭取永久和平的論調，每一個美國人民都感覺到此次犧牲要有代價，毋使戰禍重臨而今每一個美國家庭再受哭子哭夫的威脅。他們對於建設新的世界經濟的重妥，在理智上是否有深切的認識，在感情上是否有堅強的維護，我們不敢武斷。但是一件可以說的：假如大家趨取均勢縱橫捭闔舊式國際政略，恐怕要惹起美國人悔喪灰心，掉轉頭來再向關門鎖立的舊路上走。

第二個方式是信方式。我們已往所訂的鐵路借款合同，在倫敦市場所發的債票是屬於這個方式。工業先進國的重工業出品——鋼鐵機器——需要外國市場，國民蓄積需要證券投資，國際貿易的洋行需要出口生意，銀行需要匯兌業務，經理證券發行的行號需要發行利息折扣，五方面合起來便發動了國外證券投資的事業。債權的保障，除借款合同所訂的各種擔保條款而外，在經濟行為上為發行人債權信託人對於所投資的業務參加其管理，在政治行為上，為債權國可能施於債務國的力量作為其後盾。這些條件具備之後，由擔保發行的銀圓先行墊款發動業務，再將所承妥的債票陸續於證券市場售出，收回墊款。如債票不能順利售出，則須依照發行擔保的條件繼續加墊現款。因此重工業出品的廠家依然可以貨物出廠收現，貿易洋行依然可以貨物運到收現，而不影響其流動資金的運用。這是已往投資方式的正常時態。及至中國債票逾期欠付，信用喪失，不能再發新債，則有變相的短期投資，利用債權國

政府所給的出口信用，使得廠家和洋行依然貸到款收，而由中國的銀行簽發期票來保證出口信用的歸還。現在中國舊債積欠累累，在舊債未整理信用未恢復之前，無從運用這個方式；發行新債。若必急急求用這個方式，則舊債的整理與及新債的發行其條件均不得不聽命於發行財團。因此我們要十分的鄭重考慮。但是：這個方式雖然陳舊，而其資本來源為在證券市場求出路的國民蓄積，依然為國際投資商當行為的線索之大道。發行仲介機構容有變更；而各參加份子的陣容依然如昔。我們的舊債遲早必要整理，循着這個方式的外資來源遲早必須再開。但是發達恐怕不遠，性急便要吃虧。還有一層，舊日個別鐵路借款以路收作抵，足以防礙建國及之虞，於抗著「戰後鐵道交通所負的建國使命」一文之內，已經詳述，現不再贅論。

第三個方式係直接投資來經營生產事業，在工業化方面，有特別重大的關係。而且在不平等特權取消之後，新商約尚待訂之時，將來外人在華經營經濟事業，其範圍應如何決定，即為同一問題的另一面觀，更應及時秘密研究。工業化不但需要資本，而且需要技術。技術分公開和秘密兩種。公開技術可以聘請技師，秘密技術非與廠家合作不可。公開的技術如開礦築路，一般機器的製造，普通冶煉，普通化學乃至有專利權登記的製造法等等。秘密的技術大抵因為所發明的技巧寄托在製造方法和歷程之內，而不在成品式樣和性能之上，很難以專利登記來保障發明權益，所以秘而不宣。各種造製工業都有秘密技術，而以化學工業為

特多。四五十年前，我們甚麼都要請洋工程師，現在開礦築路乃至普通製造，皆已自立。但在機械冶煉化學等方面，其高等成品的製造，即使技術公開，依然經驗缺乏。

有些人主張外人可以盡量自由在華經營工礦事業，不加限制。因為這樣才能盡量引致外資。而且特權取消之後，一切受中國法律支配，無所用其限制。這樣的主張，顯然忘記了兩件大事：（一）日本在華紗廠的時形發展成了國民經濟的毒慮，（二）大西洋憲章及租借法案而後，我們有了不取差別待遇的義務。假如任何因藉的資本家都可以在華開礦設廠，漫無限制，其流弊與糾紛的嚴重，讀者當有領會。

在另一方面，我們的法律對於外人合作經營生產企業（礦及其他），一定要百分之五十一股權屬於中國。這個辦法並不能限制外人的實權，反而限制了資本的輸入，因為股東會而外還有董事會，而董事的職權係以組織章程來規定的，其中便儘有出入之處，這樣的法律既是呆板，又復空洞。重要的不是公司內部的業務管理權，而是（一）該公司的企業行為是否合乎我們的經濟國策，（二）該項企業是否適宜由外人經營，（三）即使適宜是否可由任何國籍外人經營而無流弊。我們剛踏上自強自立之路，許多事情都要因時制宜，因勢制宜，而不可以一概論。所以過於呆板的法律是不適用的。過嚴有過嚴的空礙，過寬有過寬的流弊。

因此個人主張制定外人經營生產事業特許法。此後外人在華開商可以自由，但如經營工

礦及其他生產事業，不論中外合資或全數外資均須按照特許法由政府特准，如此我們便可以有限敏活的運用。這個特許法祇要把幾種重要的大原則規定下來，不要呆板，不要瑣碎，讓行政當局能夠在這大範圍內因事制宜。

五 國際匯兌

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如要暢通，必須穩定國際匯兌，這是誰都承認的。假如戰後各國仍然回到上次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老套，各謀自顧，不講互助，把關稅壁壘，貿易限制，通貨貶值，外匯管理等等武器，應有盡有的拿出來，彼此報復，彼此抗拒，那世界和平的前瞻便安十分黯淡了。此次英國和美國都擬有穩定國際通貨計劃。這兩個計劃兵點雖多，但同樣的主張把決定和變更匯兌率的主權交給國際機構，這一點是最重要的。這樣的辦法，如果能夠合理的實現，繼續的維持，可以說是國際經濟上劃時代的建設。

最固定的匯兌率是各關係國都採用無限制的金本位的場合之下的匯兌率，一切國際貿易與投資以及國內生產與分配，皆旋繞着這個磐石——黃金流通及其與貨幣的轉換，在國際與國內的絕對無限制的金本位——而自行調節，自行變動，自行遷就。這是自由經濟的極則。如果世界到了大同境界，彼此休戚相關，不分畛域來分工合作的時候，確是個良好制度。可惜金本位在帝國主義的十九世紀便已推行，未免過早。所以在產茶葉的殖民地，祇好老是產

茶葉，做「苦力」的祇好老是做「苦力」，生產內容的進展，生活水準的提高失了主動權。在這樣的制度下的因果連鎖是：匯率決定國際貿易，而國際貿易又決定國內生產。反之離開金本位而又運用自主權來管理匯兌與決定匯兌率的因果連鎖是：按照在國內所希望實現的生產理想和分配理想來決定匯兌率，再由所定的匯兌率來決定國際貿易。這是上次經濟大恐慌的時候，大家競取的政策。此排彼拒，其結果又使得世界經濟愈加收縮，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開始已經說過，我們需要大量借入外資來促進工業化。但是工業化的建設需要時間。要所建設的發生效用，更需要時間。在他尚未能充分發生效用，增加我們的出口，來償付外債的時候，我們一樣要還本付息。於是國際收支發生重大的逆差。應付這個逆差祇有兩個方法：（一）金融借款（二）貶低匯兌率。（外匯管理貿易管理除外）

六 結論

我們需要民生主義的工業化，我們也要分肩改進世界經濟的大責：前者是自立，後者是互助。這兩個理想不但不衝突，而且必須互相為用然後相得益彰。我們地甚大物不太博而人更多的中國，先天的不如蘇聯，不能學他關起門來建設。剛踏進有立自強之路的中國需要和平，而國際合理的經濟合作為奠定和平的基石。由強中最強的美國尚且幾棄孤立，難道四強

中最弱的中國，忽然關起門來從事國防建設，可以算是理智嗎？可是合作必先要互信，未有互不互信而能正人，亦未有己不謀而能求他人相信，此後國際間一舉一動關係太大。和氣可以漸放致祥，而和氣却要馬上致戾，整個的世界，還是站在三岔路口呢！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經建五論 全一冊

定價國幣洋 ~~十元~~ 十元

定價國幣位拾元

著 者

陳 伯 莊

編輯及發行者

中國經濟建設協會
(重慶牛角沱二十六號)

印 刷 者

中國農民銀行印刷所
重慶 化龍橋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湘鄉李誠... 國... 家... 號

114

定價國幣伍拾元